

赵敦华讲波普尔

赵敦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敦华讲波普尔/赵敦华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未名讲坛)

ISBN 7 - 301 - 10398 - 0

I. 赵… II. 赵… III. ①波普尔, K. (1902 ~ 1994)
—生平事迹 ②波普尔, K. (1902 ~ 1994)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480 号

书 名: 赵敦华讲波普尔

著作责任者: 赵敦华 著

丛书策划: 杨书澜

责任编辑: 李廷华

版式设计: 王炜焯

标准书号: ISBN 7 - 301 - 10398 - 0/G · 182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电子信箱: xuyh@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5.125 印张 106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 1}

赵敦华讲

波普尔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的历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史文化的发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编这套《未名讲坛》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启迪人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书《未名讲坛》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2005年8月8日

前 言

中国人对波普尔并不感到生疏，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被介绍进来的第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中，这位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哲学家，一时成为关注的亮点。然而，这股“波普尔热”现在已经为“海德格尔热”、“后现代热”、“尼采热”等后起的时髦话题所替代。在政治哲学领域，人们现在热衷于罗尔斯、哈耶克、列奥·斯特劳斯，却很少提及波普尔，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奇怪的事；至少在谈哈耶克时不谈他的这个同乡和同道是很奇怪的。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重提波普尔是否合乎时宜呢？

我想，对于在各种西方文化热中产生了茫然失措感的中国人说来，下面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我们在这些热门话题里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学习西方文化固然少不了赶时髦心态的推波助澜，但如果由此而产生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学风，那就不足取了。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很多人像观赏香榭丽大街的时装橱窗一样看待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我却宁可把西方哲学的世界看作是布满尸骸的战场，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黑格尔所说的“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

赵敦华讲

波普尔

们的较量”。

我的这一看法和波普尔哲学的使命与命运甚为契合。波普尔高扬理性批判主义的旗帜,对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中的流行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然而,在后浪推前浪的文化思潮中,波普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被批判,被扬弃,被后来的流行理论所代替。因此,介绍波普尔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批判主义,既要全面地介绍波普尔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也要让波普尔哲学接受批判和反批判。

必须承认,我并不信服波普尔哲学,但这应该并不影响对波普尔思想作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本书的重点是谈我对波普尔的看法。我的谈法分两部分,前四讲的内容主要是谈我对波普尔思想的理解,第五讲谈我对它的评论和批评。我在谈波普尔时力求做到公允地对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即使在最后的批评部分,我也要尽量避免个人误解和偏见,尽量利用其他哲学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为立论依据,说明波普尔哲学的地位、作用和缺陷、弱点。总之,我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别人相信波普尔哲学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如果读者能从西方人对待自己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的态度中看出一些门道,则笔者幸甚。

赵敦华

2005年10月修改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讲 探索的一生	(1)
第一节 家庭环境	(2)
第二节 1919年	(3)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的写作	(7)
第四节 《开放社会》的写作	(9)
第五节 后期思想	(13)
第二讲 猜想与反驳	(17)
第一节 休谟问题的三个解决方案	(18)
第二节 波普尔的解决方案	(21)
第三节 证伪原则	(27)
第四节 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	(31)
第五节 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	(40)
第六节 批判理性主义	(45)
第三讲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50)
第一节 历史主义及其心理学根源	(51)
第二节 历史主义的哲学传统	(56)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65)
第四节 乌托邦工程和渐进社会工程	(73)
第五节 开放的社会	(80)

赵敦华讲

波普尔

第四讲	客观知识的世界	(89)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	(90)
第二节	实在论的研究纲领	(95)
第三节	进化论的研究纲领	(102)
第四节	三个世界的理论	(113)
第五讲	理性批判主义的理性批判	(122)
第一节	波普尔哲学的影响	(123)
第二节	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批评	...	(128)
第三节	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批评	(137)

赵敦华讲

波普尔

第一讲

赵敦华讲

波普尔

探索的一生

197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期间,一批左翼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入侵”。他们所谓的“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大概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说波普尔哲学带有右翼的自由主义色彩,其二是说它属于和欧洲大陆哲学相对立的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传统。这些学生可能不知道,虽然波普尔的大部分著作是用英语写成,但他的思想却是在一个德语国家——奥地利的文化沃壤中萌芽的。1976年,波普尔出版了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早在1919年左右,当他还是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学生时,波普尔便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波普尔始终没有离开他青年时代就业已成熟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哲学园地中的一株幼苗

是如何长成为参天大树的。

第一节 家庭环境

卡尔·莱芒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于1902年6月28日出生于奥地利。他的家庭有犹太血统,但皈依了基督教。他的父亲西蒙·西格蒙德·波普尔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一个拥有自己事务所的律师。同时,老波普尔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工作者。作为当时还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济会成员,他热心从事管理孤儿院和收容所的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欧洲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对立的格局之中,老波普尔是代表了激进自由主义主张的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穆勒的信徒。他又是一个涉猎广泛、多才多艺的学者:精通希腊文,在历史学研究中颇有造诣,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波普尔家中有一个收藏甚丰的图书馆,里面既有从柏拉图到马赫的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也有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波普尔的母亲燕妮出生于音乐世家,擅长钢琴。儿童时代的波普尔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满屋书香和音乐的气氛之中。据他在自传中所说,他8岁时就开始想到有关空间无限性的问题。从12岁开始,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的哲学书籍。先后读了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人的著作。虽然小波普尔对这些著作似懂非懂,但他已经接触到了哲学的真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波普尔才是12岁的孩子。在举国上下的好战的狂热气氛中,他也曾经相信

自己的国家正在进行正义的战争。两年之后,他通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奥地利理应在战争中失败。他的父亲非常认真地倾听了他陈述的理由,和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最后表示同意儿子的立场。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他15岁时。当时他按照父亲的建议,读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伯格的自传。这本书始终强调词的意义的的重要性。波普尔觉得这种过分的强调近乎蒙昧主义。但是,当他向父亲解释自己立场时,他却不得不澄清自己所用的词句的意义。结果双方都为语言纠缠不清,讨论毫无结果。波普尔把这场争论称为“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他由此领悟出一条终生都恪守不渝的原则,这就是:决不要纠缠于词和意义的问题。这条原则与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对词义的偏爱格格不入。因此,波普尔即使在成名之后,在英美哲学界都有落落寡合之感。

第二节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以德、奥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维也纳充满着饥馑、骚乱和通货膨胀。但是,维也纳同时也是各种创造性思想的摇篮。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政治学理论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波普尔其时年方16岁,中学里讲授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于是在毕业前离开中学,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旁听生。维也纳大学的学生风华正茂,思想活跃。这段时期的生活给波普尔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

研究,去粗取精。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①

波普尔称1919年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决定他终生思想的两件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一是与爱因斯坦结下不解之缘。

波普尔通过他的幼年朋友昂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昂特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俄国革命者。昂特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向当时才十岁的波普尔讲解马克思的理论,还带他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但是,昂特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指责布尔什维克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政治舞台上,左派阵营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反对右派势力。波普尔参加了左派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且一度信服了共产主义。然而,1919年的一天,他目睹一群青年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血腥镇压。波普尔的结论是:这件事验证了昂特对共产党人的评价,即,共产党的策略是人为地加剧社会矛盾,用激起统治者镇压的手段来诱发阶级革命。波普尔对任何可能引起流血和恐怖的手段感到厌恶,这导致他转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来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他在自传中写道:“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①

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有着特殊含义，它特指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1919年记载着相对论的辉煌胜利。1915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根据这一理论，爱因斯坦推断说，由于引力造成的空间弯曲，光在引力场中沿曲线传播。他还计算出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斜的曲率。在正常情况下，太阳附近的光线是无法观察的。1919年5月29日发生日全食，英国爱丁顿爵士率领考察队在全球的两个不同地点，观察到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的轨迹，观察结果和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合。这一发现震撼了科学界，波普尔也为之倾倒。他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讲演会，并从一个学数学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相对论的要点。其中最使他着迷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在自己的预言尚未被验证之前，爱因斯坦便坦率地说，即使以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是，如果观察与自己的预言不符合，那将确定地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观察到的事实不能证实，但却能证伪与此事实相关的理论。波普尔说：“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寻求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够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①

1919 年左右，波普尔还接触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他还在阿德勒本人开设的儿童心理诊所做过一些无报酬的义务工作。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爱因斯坦理论相比较后说，前者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并且，这些解释是不可证伪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下水去，弗洛伊德会作出这般解释：损人者的行为是他的性意识受压抑所致；如果一个人把一个溺水者救了上来，弗洛伊德也可作出另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救人者的行为是他那被压抑的性意识“升华”的结果。同样，阿德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说，用自卑感来解释这两种不同现象：损人者试图证明自己敢于犯罪，救人者则证明自己乐于施惠；两种行为是对下意识的“自卑感”的克服。波普尔对这些故步自封的学说有切身体会。有一次，他向阿德勒报告说，一个病例不能用自卑感理论加以分析。阿德勒却武断地回答：这一病例不会与他的理论相矛盾，“因为我有上千次的经验”。波普尔不禁反唇相讥：“由于这个新病例，你现在有了 1001 次经验。”^②

波普尔说，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爱因斯坦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 页。

^②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 页。

相对论三者的区别在于,精神分析学说不作任何预言,但却宣称能够解释一切有关意识的现象,它与形而上学、巫术、乃至点金术一样,属于“前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针对某一特定现象作出精确的预言,并且承认,符合预言的事实不能证实自己的理论,但不符合预言的事实却能证伪这一理论,这是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介于两者之间,马克思作过预言,比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可以被事实证伪的,因而是科学的。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种种辅助性的特设,把马克思的结论修订为不可证伪的。在波普尔看来,这一修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伪科学。

波普尔说,1919年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性的一年,他在这一年里萌发的对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酷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等学说的再认识,分别成为他后来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两大基础。一个年方17岁的少年其时已经找到了供他终生受用的精神食粮之源,这既令人羡慕,也使人担心。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既可以解释他的哲学的优点,也可以解释它的弱点:其优点是刻意创新,明晰尖锐;其弱点是偏执一端,不求深刻。两者都是一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似的少年的思维特点。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的写作

1922年,波普尔通过入学考试,由旁听生转为正式大学生。战后的通货膨胀使他的家庭经济情况恶化,他不得不自谋生计,半工半读。他当过木匠、保育

员、小学教员。在学校里,他广泛涉猎各门课程:数学、理论物理学、历史、心理学和哲学,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尤感兴趣。1928年,他递了题为《论思维心理学中的方法问题》的博士论文,通过考试,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次年,他又提交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通过了中学数学和物理教师的资格考试,取得中学数理教师的职位。

其时的维也纳,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策源地,一群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中在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石里克周围,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波普尔从来没有参加过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活动,但他参加了该学派一些外围团体举办的讨论会,结识了学派成员菲格(H. Feigl)、克拉夫特(V. Kraft)和魏斯曼(F. Waismann)等人。波普尔曾与菲格通宵达旦地交谈。菲格赏识波普尔的新鲜思想,鼓励他著书立说。波普尔按照这一建议,于1932年写成《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一书。

波普尔在这本书中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以及科学方法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手稿的题目是“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波普尔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科学的标准是证伪,那么,科学的进步不能依赖归纳法,科学的方法就应当是一种以批判为目标的演绎推理。波普尔把这种方法称为试错法,其过程是这样的:先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说和猜想进行检验,在检验过程中不怕淘汰、修改和更新原有的假说和猜想。他断言,能够一劳永逸地证实一个假说和猜想的归纳过程是不存在的,不能被证伪的理论便不是科学的理论。

波普尔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针锋相对。实证主义者提出,证实原则是区别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试金石;证实的过程主要是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的过程。即使如此,维也纳学派成员对波普尔的意见也十分重视。因为波普尔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石里克(M. Schilck)、卡尔纳普(R. Carnap)、纽拉特(O. Neurath)、弗兰克(Ph. Frank)和汉恩(H. Hahn)等人都阅读过波普尔著作的原稿。石里克和弗兰克同意在他们主编的《科学世界观论文集》的丛书上发表。但出版商嫌原稿太长,坚持要作大幅度删节才能出版。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只有原稿的一半篇幅。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人并没有看出波普尔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还以为波普尔也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第四节 《开放社会》的写作

《研究的逻辑》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波普尔因此声名鹊起,收到了来自欧洲各国请他去讲演的邀请。1935至1936年间,他对英国作了两次长期访问,在剑桥、牛津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作了多次讲演。在这些讲演中,他一方面解释了《研究的逻辑》中科学哲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开始把视野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当时欧洲紧张的政治局势迫使他不得不深入思考他在少年时代想到的一些政治观点。如前所述,他在17岁那年就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当时左派和右派进行搏斗的关键时刻,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来帮助右派。相反,他钦佩维也纳的工人运动,为这一运

动的失败感到惋惜。他指责共产党应为这一失败负责。他认为,共产党首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诉诸暴力,其后,当资产阶级极右派——法西斯攫取政权之后,它又放弃反抗,以为法西斯统治比资产阶级温和派的统治更容易激起人民的反抗。波普尔说,这种政策基于对革命不可避免性的信仰,这一信仰造成了欧洲的灾难。他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信仰称为“历史主义”。反对历史主义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点。

1936年,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批判历史主义讲演,演讲稿刊登于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题为《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当该著作于1957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发表时,波普尔在书的扉页写了一段题词:“为纪念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历史命运不可抗拒之规律的信仰而牺牲的各国、各民族的无数男女。”他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呢?他的理由是:虽然两者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但它们的理论基石却都是历史主义。所谓历史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一条决定社会发展的铁则,历史规律的最终实现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努力可以加速或延缓其实现,但却不能创造或取消它。根据历史主义的信念,社会成员被分成两部分:历史规律的推动者和阻拦者。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这两部分人的斗争史。斗争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推动者随着历史规律的实现而成为社会的主人,阻拦者则如同挡车螳螂一般地被历史车轮所碾碎。波普尔进一步说,历史主义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历史规律被理解为“天命”或“神意”。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选民”与“弃

民”、信徒与异端之间的斗争史。在现代社会中,历史主义换了新的形式。法西斯主义认为,历史规律是种族之间优胜劣败、强食弱肉的铁则,社会发展表现为高等种族淘汰低劣种族的史。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典型的历史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经济发展规律是历史规律,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主人。

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与他对科学哲学中的证实原则一脉相承。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的认识总是可以证伪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服从证伪原则。因此,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被揭示了的永恒的历史规律。由此可见,证伪原则是波普尔思想的核心。

1937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已经蔓延到奥地利。具有犹太血统的波普尔为着逃避迫在眉睫的种族迫害,不得不申请国外的教职。他的申请书得到了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和摩尔等第一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推荐。他同时收到了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书。为了援助维也纳学派成员魏斯曼,他把剑桥大学的职务转让给魏斯曼,自己于1938年前往新西兰。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一直在新西兰执教。教学之余,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以下简称《开放社会》)。

据他自己说,《开放社会》是比《历史主义的贫困》更为重要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波普尔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考察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都被描绘成历史主义的奠基人。历史主义进一步被说成是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开放社会所依赖的理性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所有倡导和拥护历史主义的哲学家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他重点批判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说他们都是“错误的预言家”。波普尔抨击最有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最严密、最精巧的历史主义,是历史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受不住理性的批判,那么,其他形式的历史主义自然也都站不住脚了。波普尔说:“《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会成为—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操纵主义’)的思想影响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对迷信历史主义的危险提出警告。”^①

恰如波普尔所说,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之后,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成为西方国家抵御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武器。由于这一现实作用,这本书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颁发的大奖,广泛流传于学术界和舆论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波普尔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的逻辑》。可以说,虽然波普尔的处女作是科学哲学的著作,他的成名作却是政治哲学的著作。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第五节 后期思想

1946年,波普尔来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任高级讲师,开设“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课程,但因这方面的课程不设教授席位,波普尔即使已经拥有国际声誉,但却一时不能成为教授。直到1948年,由哈耶克提议,校方才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的席位。1950年,波普尔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年,波普尔出版了《研究的逻辑》一书的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把德文版中压缩的内容补充进去。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跋》,但却没有随书同时发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跋》的三卷分成三本单独的书发表,其中:《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1983)是《跋》的第一卷,《开放的宇宙》(*The Open Universe*, 1983)是第二卷,《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 1982)是第三卷。1963年出版论文集《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1969年波普尔辞去教职,居住在白金汉郡的潘恩镇,专事研究著述。1972年发表论文集《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上卷中的“思想自传”的修改版后来以《无穷的探索》(*Unended Quest*)于1984年单独出版。1977年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

赵敦华讲

波普尔

脑》(The Self and Its Brain)。

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波普尔自幼养成的思维习惯使他不愿纠缠于词语意义之争。因此,他的思想在英美职业哲学家的圈子里显得不合拍。误解、贬低,甚至压制他的思想之事屡有发生。早在1936年,波普尔第一次访问英国,应邀在剑桥的亚里士多德学会上发言,当他对归纳法提出批评时,全场听众如同在听笑话。20世纪40年代,他把《历史主义的贫困》稿件寄给英国权威性哲学杂志《心灵》(Mind)遭到拒绝。《开放社会》一书脱稿之后,被寄往英国,也曾被一位权威人士判为“不宜发表之作”。1946年10月,波普尔到剑桥大学做讲演,认为哲学问题不是伪问题,而是真实的。时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维特根斯坦打断了他的话,要他举出哲学问题的例子。波普尔举出的例子都被维特根斯坦当作逻辑和数学问题一一排除。最后维特根斯坦挥动着火钳(当时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对波普尔说:“举一个道德准则的例子!”波普尔应声回答:“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来访的讲演人。”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冲出会场,嘭地一声关门。^①据另外一个传说版本,罗素赶去把维特根斯坦拉回到主席座位上,对他喊到:“维特根斯坦,这是你的不对!”

波普尔与分析哲学家的分歧是两种哲学观的交锋。分析哲学家主张哲学和科学的区分,强调哲学自身并不能增加人类知识。波普尔却强调,哲学是科学方法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具有指导作用。波普尔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29页。

反对把哲学变成脱离科学和社会现实的“纯”理论。而在以语言分析为职业的哲学家的心目中，波普尔的哲学缺乏思辨性和理论深度。然而，波普尔哲学却因其与科学和政治的密切联系赢得了很多读者。为表彰他的贡献，他于1965年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称号。

晚年的波普尔不满足将自己的哲学局限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符合科学成果的系统的世界观。他的理性批判主义不再囿于科学方法论，而变成了一种独立于物理世界和个人意识世界的客观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知识世界发展的动力，扎根在人类的本性之中。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到今天，并且将有更为美好的明天。

1976年7月1日，波普尔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一名参加第一次登月活动的太空人，在回到地球之后曾说过一句简单而又充满睿智的话：‘在我一生中，我总算看到了另外一些星球，不过地球却是最好的一个。’我认为这句话不但闪烁着智慧，而且闪烁着哲学的光芒。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上面，为什么在这里会有生命。生命把我们的星球点缀得多美啊！对此，我们唯有怀着一种惊喜交加之情。这就是说，地球的美好在于生命的美好，而生命的美好在于理性批判力量的美好。至于为什么我们会具有如此美妙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谜，一个值得为之惊奇而又无法解开的谜。”

正是这一无穷的奥妙，吸引着这位哲人做终身的探索。波普尔于1994年9月17日逝世，享年92岁。

综观波普尔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经历了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他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同一个中心思想:理性的批判是科学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是民主的保障,是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是宇宙的精华。本书的结构按照波普尔思想发展的三阶段,对他的理性批判主义作重点介绍。

赵敦华讲

波普尔
Popper

第二讲

赵敦华讲

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序言里，波普尔明确地说：“科学知识的增长是知识增长的最重要、最有趣的实例”，“认识论最重要的传统问题——和知识增长相联系的问题……需要对科学知识作分析”的增长的研究是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方式。^①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知识的进步之所以是人类知识增长的最明显的例证，这是因为科学知识是一个新的理论不断地替代旧理论的过程，而不仅仅表现为知识内容在数量上的递增。通常，人们喜欢把人类知识比作一座大厦，知识的增长犹如在一个坚实的地基上进行的一砖一瓦的递进式的构造。但是，波普尔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因为人类知识没有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基础：知识的增长

^① K. R. 波珀（即波普尔的不同译法，下同）：《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 xiii、xvi—xvii 页。

也不是以现存知识为基础的构造,而是对现存知识的破除。并且,破除旧知识和构造新知识表现为同一过程,也不能用拆旧屋、盖新房的比喻来形容。

正是因为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看法与传统观念根本不同,他的科学哲学和传统的认识论相比较,有着不同的“聚焦点”。传统认识论关心的是知识的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的性质、范围等诸问题。而波普尔的中心问题始终是科学方法的问题。研究他的科学哲学必须从科学方法论谈起。

第一节 休谟问题的三个解决方案

在传统认识论“基础论”的模式里,科学的方法被归结为由经验为基础的、对实验观察的结果进行归纳的方法。16和17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 Bacon)首先对归纳法作了哲学上的总结。按照他的观点,感觉经验是可靠的,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进行加工和分析,在重复的材料中找出一般概念和原则,这就是归纳的过程。它包括下面几个步骤:(1)观察与实验;(2)对观察、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总结;(3)提出假说;(4)通过实验对假说进行证实;(5)把证实了的假说表述为理论。

1. 休谟问题

长期以来,归纳法一直被奉为实验科学必须遵循的方法。培根也因提倡归纳法被人称作近代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始祖。然而,在哲学史上,并非没有人怀疑过归纳法的合理性。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

(David Hume) 就曾对归纳法提出挑战。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出发,得出了怀疑论的结论。他说,感觉材料的反复出现,充其量只是证明了这些感觉材料在过去发生过联系,但却不能证明这种联系在任何时间都会发生,因而也未能证明这种联系是必然的联系。比如,在九千九百九十九次观察中,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但这还是不能保证在第一万次的观察中,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也许,一个突发事件会切断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这种联系。休谟还分析了为什么归纳法不能保证科学规律确实性的原因:感觉材料之间只存有偶然的联系,而科学规律却必须具有必然性。加之,偶然和必然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而科学的方法却必须服从于逻辑思维。因此,归纳法不能证明普遍适用的科学规律和事物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

培根和休谟都是相信经验感觉的“基础论”者。他俩的分歧在于:培根相信,归纳法和经验基础论是一致的,归纳是发现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休谟则指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经验基础上用归纳法建立起来的知识是不可靠的。

2. 康德的解决方案

面对着休谟的挑战,人们不得不在必然真理和归纳法之间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或者否认归纳法是发现真理的方法,但仍然坚持科学真理的必然性;或者继续坚持归纳法,但否认科学真理的必然性。18 世纪末期的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力图证明先天范畴在科学中的作用:人们只有在先天范畴所规定的框架内对感觉材料进行综合,才能得

到必然的科学真理。牛顿物理学被康德解释为“先验综合”的范例。康德的先验综合的方法在哲学上有着重大意义,但却没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3. 经验主义的方案

包括休谟在内的经验主义者都选择了上面所说的第二条道路。休谟区分了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只有数学的和逻辑的真理才是必然的,必然真理的发现和证明不靠归纳法。科学真理或关于事实的真理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偶然真理。休谟认为,归纳法的本质不能用逻辑,而应该用心理学来说明。归纳实际上是一种在重复过程中把几个感觉印象联系在一起的心理习惯。比如,由于习惯的作用,当一个感觉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然地会联想、期待、或者相信另外一个感觉材料也会随之而出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果关系。休谟的结论是,归纳法不能证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未能满足严格的逻辑推理和追根求源的思辨的要求。然而,不能因此而否认归纳法的作用。因为它在人的心灵中造成的联想习惯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我们必须满足归纳原则,并且把它当作我们的生活所能认定的最后原则。

4. 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案

20世纪初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遵循休谟关于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的区分,提出了著名的证实原则:一切关于事实的判断有无意义取决于是否存在着能够通过经验来检验这一判断的方法。根据证实原则,科

学真理必须服从归纳法的证实、检验,归纳法是达到科学真理的必经之路。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满足休谟对归纳法的心理学解释,他们开始寻求归纳法的逻辑基础,提出了解决“休谟问题”的第三个方案。他们认为,科学真理虽然是偶然真理,但却是成功概率很高的偶然真理。归纳法的逻辑不是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和概率理论相关的、可以用符号的推演运算表示其概率的特殊逻辑,即归纳逻辑。为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卡尔纳普,发展出归纳逻辑的理论。

第二节 波普尔的解决方案

波普尔高度评价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挑战,但他也看到,即使人们知道归纳法的合理性是可疑的,他们(包括休谟在内)也不愿意放弃归纳法。这是因为人们不能摆脱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科学理论是从重复出现的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科学规律是建立在事实的重复性基础之上的。波普尔却认为,对重复性的信赖不过是一种迷信,所有关于归纳的理论都优先考虑重复性。波普尔把“休谟问题”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逻辑学的问题,休谟的答案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必然性。第二个是心理学的问题,休谟的答案是:重复的事件即使不能为一个普遍规律提供任何论证,也能引导并唤起我们心中的期望和信仰。

在波普尔看来,不论从心理学还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科学发明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对于重复出现的事物的观察。因此,优先考虑重复性的归纳法理

论是站不住脚的。

1. 归纳法的心理学理论批判

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波普尔批判了休谟关于归纳法的心理学理论。他的批判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典型的重复活动是机械的、生理的，不会在心理上造成对于规律性的信仰。比如，谁也不会简单的计数活动中发现关于数的规律。留意观察到的事物的重复性不是这种机械的、生理上的重复。因为不同时间内观察到的事物总是会有差异的。只有从某一角度，出于某一目的去观察，我们才会从不同的事物中找到相同相似之处，才会把它们看作是重复的事物。也就是说，先要有一种见解，企图、期望、假定或兴趣，然后在观察中才会出现重复感。前者是心理现象，是重复感的原因之一，它们不能反过来成为重复性观察的结果。生物学家的一个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将一支点燃的香烟放在幼犬鼻子面前，它会马上跑开。以后，不管用何种方式也不能引诱它再次嗅香烟。同样，人们在生活中的很多习惯和信念都是幼时一次性的经验所造成的。重复的事实和重复的行为一样，是在信念和习惯之后，而不是在其前产生的。由此可见，休谟认为重复观察产生心理上信念与习惯的论点是不正确的。

2. 归纳法的逻辑理论批判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波普尔继续反驳了关于归纳法的逻辑学说。休谟已经割断了归纳法与必然真理之间的联系，波普尔的工作主要是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归纳法能够达到具有

高概率的真实性的理论。波普尔反驳说,科学理论的内容不是平凡琐碎的,而是大胆的猜测,并且是在常识看来不可信的猜测。这在逻辑上意味着,科学理论为真的概率很低。波普尔的公式是:内容和概率成反比。一个理论的内容越丰富,它为真的概率也就越低。设想有三个理论 a、b、a&b。

a:地球是椭圆形的。

b: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a & b:地球是椭圆形的,并且地球运行轨道也是椭圆形的。

如果用符号 Ct 表示理论所陈述的内容,那么则有如下表示理论 a、b、a&b 之间关系的不等式:

$$Ct(a) < Ct(a \& b) > Ct(b) \quad (1)$$

如果用 P 表示理论为真的概率,现在假定

$$P(a) = \frac{9}{10}, \quad P(b) = \frac{8}{9}$$

那么,应用概率运算的特殊合取规则(因为 a、b 是两个独立的陈述),

$$P(a \& b) = \frac{9}{10} \times \frac{8}{9} = \frac{7.2}{10}$$

于是,我们有下列表示三个理论 a、b、a&b 为真的概率的不等式:

$$P(a) > P(a \& b) < P(b) \quad (2)$$

比较不等式(1)和(2),我们便可得出结论,一个陈述为真的概率与其内容成反比。这意味着,一个陈述为真的概率越高,它的内容也就越贫乏。例如,一个重言式陈述“ $A = A$ ”为真的概率为 100%,但它却几乎没有经验内容。因此,那种想通过归纳逻辑保证的

归纳法达到科学理论的努力是徒劳的。如波普尔所说：“如果你得到高概率的评价，你必须说得很少，或最好什么也不要说，重言式总会保持最高的概率。”^①

3. “基础论”批判

波普尔问道：既然科学实践并没有支持归纳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为什么人们仍然相信没有归纳法就没有经验科学的神话呢？他认为，这是“基础论”在作祟。人们普遍相信，知识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经验科学的基础是感觉经验。归纳法的认识论根源是这种基础论。

波普尔在破除归纳法的同时，也批判了认识论上的“基础论”，尤其是经验基础论。他说，经验基础论的错误在于把科学发现活动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感觉和经验观察，这是科学理论的基础；后一部分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理论。人们却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观察和理论是独立的两种活动吗？波普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任何观察都受一定的理论或理论上的倾向影响，观察不可能发生在理论之前。他举了一个实例，当他在维也纳当教师时，曾向一群学物理的学生指示：“拿起你们的笔和纸，仔细观察，然后记下观察的结果。”学生对此惘然不知所措，他们问道：“你要我们观察什么呢？”波普尔说，这个例子告诉人们：做观察，这样的指令是荒谬的。……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

^① K. R. 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235页。

兴趣、观点和问题。它的描述必需有一种拥有专门词语的描述语言；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①他说出了一个现在已经为科学家接受的事实：任何观察都要根据一定的理论才能进行，都是“依赖理论”的观察。

波普尔的观点首先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逻辑实证主义把传统经验主义中经验和理论的区别表达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区别。观察语言不受理论影响，它陈述了理论语言的证据或基础：理论语言只当在与观察语言有联系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波普尔却说，一切对观察的描述或陈述都必须使用普遍概念，而一切普遍概念都具有理论上的意向性。“这是红的”曾被认为是观察语言的最简单的例证。然而，观察者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一陈述，是因为他已经有了“红色”的概念，并且知道这一概念可以应用于何种色域。他知道红色是一个从紫红到粉红的颜色系列，并且知道这一系列的上限和下限。但是，一个颜色深到什么程度，或者浅到什么程度，才超出“红色”概念的外延呢？这是一个涉及到观察的意向性的问题。在具有不同意向性的社会中，人们或许会把我们称作为紫红和粉红的颜色排除在“红色”的界域之外，或许会把紫色也包含在“红色”之中。这些情况说明，即使最简单的概念，也需要意向性做出必要的类别和区分。而意向性又是受一定的兴趣、目的、观点、问题支配的。波普尔曾引用卡茨在《动物与人》一书中的一个例子，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说明观察对象如何依动物的需要的不同而不同：一个饥饿的动物把环境分成可以吃的和不可吃的东西，一个正在逃跑的动物则把环境分为出路和藏身之处，人也是这样。人总是先提出问题和目标，并根据需要和兴趣对外部事物作出区别，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在观察之前，人已经预先规定了观察的方向和对象。在这种预先规定中，作为理论初级形态的概念、假想无疑起了定向和定性的作用。不受任何程度的理论影响、而又能为理论提供基础的“纯粹”观察是不存在的。

寻求知识基础是一种错误，但这一错误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一种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普遍倾向。波普尔认为，寻求安全感是人的首要心理需要。人追寻知识的目的最初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括获得更为可靠的庇护。最可靠的庇护是确信的知识。因此，人们倾向于把知识与确信等同起来，把获得知识的过程等同于证实。经验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知识基础的探讨都出自于寻求安全感这一人性倾向。波普尔抨击了这一倾向：“经验主义者的问题——‘你如何知道？你的断定的源泉是什么？’——在提法上就是错误的。这不是表述得不精确或者太马虎，而是它们的构想不对：它们是些企求独裁主义回答的问题。”^①所谓知识论中的独裁主义指的是一劳永逸地证实知识真理性的企图。独裁主义用证实排除了对证实过的知识的批判和否定，它也可以称作证实主义。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在波普尔看来,传统知识论之中的归纳法、基础论和证实主义之间存有“一损皆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波普尔的任务不仅仅是提出一种与归纳法不同的科学方法,他还必须提出与基础论和证实主义相对立的关于科学知识的一般性理论,建立起能够合理地阐明科学性质、任务和发展趋势的科学哲学。

第三节 证伪原则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与传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证伪主义与证实主义的对立;第二,试错法和归纳法的对立;第三,理性的批判精神和教条主义的对立。以下分别说明。

1. 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是和证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关于科学理论的检验原则。和证实主义相比较,证伪主义有两个优点。

第一,科学理论一般都表达为全称判断,经验的对象却总是个别的。个别的事例无论重复多少次,也证实不了一个全称判断。例如,即使我们观察到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也不足以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一个全称判断。因为我们的观察不可能穷尽所有天鹅。然而,只要我们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我们便可以立即证伪这一判断。因此,只有坚持证伪原则,我们才能够把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换言之,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的试金石,其真实原因不在于经验能够证实理论,而在于经验能够证伪理论。

第二,科学史中的事实证明,当人们寻求证实而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借助一些辅助性的特设来为预先设定的理论辩护。仍以上面的事实为例:当一只黑天鹅被发现时,人们可以做出一些特设,把黑天鹅排除在“天鹅”种类之外;或者作出另外一些特设,使得只有白天鹅才能满足天鹅的特征。这样,证实主义往往堕落成为教条主义者进行辩护的工具。证伪主义可以避免辩护主义、教条主义的危险。根据证伪原则的要求,人们不必害怕,更不必想方设法地消除与理论不符合的事例。相反,应当欢迎这样事例的发现。证伪原则告诉人们,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是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地证实,但却会随时被证伪。

2. 试错法

证伪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是试错法。试错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大胆地提出猜测和假说,然后努力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相符合的事例,并根据事例对假设进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在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再提出更好的假说,运用同样步骤对其进行证伪。试错法没有终点。试错法的目的不是最终找到一个不再能被证伪、不再适用于试错法的假说。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完善或者否定是永无休止的。我们只能说,试错法“试”出了一个较好的假说,但却不能说,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是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试错法在本质上是演绎的方法。在方法论中,人们通常把从一般原则推导到具体事例的过程称为演绎,把由具体事例推导一般原则的过程称为归纳。人

们普遍认为,归纳法是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演绎法的适用范围是数学、逻辑等抽象思维学科。波普尔不但否认了科学理论的发现是归纳过程,而且进一步说明,经验科学方法的性质是演绎。如果说,归纳法的程序是:事例—假说—事例,试错法的程序便是:假说——事例——(更完善的)假说。这在逻辑中被称为否定后件推理(modus tollens),其符号形式是:

$$(P \rightarrow Q) \& \sim Q \rightarrow \sim P$$

例如:P: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Q:每一只天鹅都是白色的。

“P 蕴含(\rightarrow)Q”是假说。

观察的结果是 $\sim Q$:有一只天鹅是黑色的。

因此,结论是 $\sim P$:“所有的天鹅是白色的”是错误的。

从形式上说,试错法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演绎推理。作为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它显示了科学的演绎性质。

3. 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般说来,推崇演绎法和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相联系,而归纳法的哲学基础是经验论。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和恢复演绎法在经验科学中地位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他曾说过,他最崇拜的四位伟大哲学家是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和休谟。这四人当中,三个人的哲学富有理性主义精神。休谟虽然是经验主义者,但却怀疑归纳法的合理性。从历史渊源上来判定,波普尔无疑具有理性主义者的气质。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波普尔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不要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立的传统

模式中看待他的哲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在“知识的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针锋相对,但两者都承认,知识起源于一个恒久不变的基础。它们的分歧仅在于,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的基础是必然的、普遍的原则,而经验主义者则认为它是人的经验感觉。波普尔不但反对经验主义的基础论,也反对理性主义的基础论。根据他的证伪原则,一切理论或原则都可以被证伪。没有任何原则可以永久经受证伪的考验而成为知识的不变基础。把抽象的理性原则当作知识的基础是比经验主义的基础论更为危险的教条主义。再者,波普尔从未全盘否认经验主义。经验虽然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不变基础,但却是检验知识的标准。一个假说在未被经验检验之前,与神话和幻想没有多大区别。只是由于经验事实所起的证伪作用,假说才成为科学的理论和知识。

为了和传统的理性主义相区别,波普尔将他的理性主义称作理性批判主义。其特点是对现存的假说、理论和知识进行理性的批判。所谓理性的批判,首先就是证伪、试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好的假说与猜测。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波普尔用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批判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差别。他把经验主义的基础论比作“精神水桶说”：“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的精神便类似于容器——一种水桶——知觉和知识都积累在里面。”^①获得知识的过程好像是把经验材料注入水桶之中,像榨葡萄一样从经验中吸取出知识。批判理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

性主义好比是“探照灯”：人的理性好像是一盏探照灯，它以假设向导观察的类别、角度和方向，照亮未知的领域。“正是假设成了我们的向导，引导我们得到新的观察结果。”^①

第四节 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

我们方才还是在哲学认识论的范围里介绍波普尔的观点。这些观点一旦被运用于对科学之目的、性质、界限以及发展方向的反思，一个崭新的科学观便诞生了。

赵敦华讲

波普尔

1. 非科学 \neq 错误，科学 = 可错

波普尔一直坚持说，在对科学进行反思的诸题材中，对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反思最为关键，这是科学哲学中大部分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波普尔的这一判断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提出的。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并不是贯穿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关键问题。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科学与哲学，乃至宗教、神话混合在一起，人们并未感到把科学从人类思想领域中区分出来的需要。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家们才觉察到传统的哲学观念对科学发展的束缚，于是才有实证主义思潮的滥觞。实证主义的目的是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并且以科学的名义取消形而上学。波普尔关于科学界限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证主义者提出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的问题进行再思考的结果。他得到的结论却与实证主义不尽相同。

波普尔所要区分的不仅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而是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非科学不但包括伪科学,也包括像数学、逻辑学这些不受经验检验的学科。波普尔心目中伪科学的例子有心理分析学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占星说、骨相等。波普尔一再声称,这样的区分并没有取消非科学领域的非分之想。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不是正确的理论与错误的理论之间的界限。这一立场同通常流行的“科学即正确,非科学即错误,伪科学即无知愚昧”的公式完全不同。这是因为:第一,非科学中也包括像数学、逻辑这样的真理;第二,更重要的是,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一样,都既包含着真理,又包含着谬误。“虽然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①

波普尔一反人们的常识,别开生面地提出,科学与伪科学(注意:不是非科学)的界限在于,科学是可误的,而伪科学是绝对无误的。科学不是绝对确实的真知识,绝对无误恰恰是幻想的特征。按照波普尔的科学观,每一个科学命题都必定永远是试探性的,它可以得到确认,但是,每一确认都是相对的,也是对其他命题的试探。科学的精神不是昭示无法反驳的真理,而是在坚持不懈的批判过程中寻找真理。要求判断的绝对无误不是科学家的态度,而是信仰者的态度。伪科学以绝对无误性为目标,并且以自身的方式达到了这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一目标。但是,绝对无误性并不是什么优点,相反,它恰恰是一个学说的致命弱点。一个学说之所以绝对无误,并不是因为它表达了确凿可靠的真理,而是因为经验事实无法反驳它。数学和逻辑命题虽然也不受经验事实的检验,但它们并不要求具有经验的内容,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必然真理。然而,伪科学宣称能够解释一切经验事实,但又不受经验事实的检验,这就是其之所以为伪科学的原因所在。广义地说,科学与非科学(包括数学、逻辑和伪科学)的界限在于是否能够被经验所证伪。

2. 科学检验 = 可证伪性

波普尔把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可反驳性(refutability)和可检验性(testability)当作同义词使用,它们都是判别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依据。这意味着,一个严肃的科学检验必须极力搜寻可以反驳假设的否定性事例,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试错过程。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有下面两个特点。

可证伪性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与经验内容成正比。在两个假设之间,如果一个比另一个具有更大的可证伪性,这就是说,它有更多被推翻的机会,那么,它对现实便作了更多的判断,因而也就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内容。这一结论实际上是“理论的内容和它为真的概率成反比”公式的推论。在前例中,理论 a&b(“地球是椭圆形的,并且地球运行轨道也是椭圆形的”)和理论 a(“地球是椭圆形的”)或理论 b(“地球运行轨道是椭圆形的”)相比,有着较多的经验内容和较小的为真的概率,而一个理论为真的概率较小,意味着它的可证

伪性较大。

可证伪性的第二个特点是检验的严格性。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尔指出:“决定验证度的与其说是验证的数目,不如说是所说的那个假说能够并且已经经受的种种检验的严格程度。但是检验的严格程度本身取决于可检验性程度,并且因此取决于假说的简单性:高度可证伪的假说,或更简单的假说,也是高度可验证的假说”^①可见,检验的严格性取决于可证伪性的程度。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越高,它所能经受的检验的严格性也就越高。那么,什么是检验的严格性呢?严格性有两个参数:证据和背景知识。设我们有理论 T,背景知识 K 和检验 T 所得到的证据 E。如果 E 相对于 K 来说,是不可信的,但相对于 K 和 T 来说,却能给予 T 以必要的经验支持,那么,E 对于 T 的检验便是严格的。这里所说的背景知识,指的是在检验时刻被本领域科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知识。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流行观念。根据背景知识 K,人们不可能期待着事实 E 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提出了和 K 不同的假说 T,出人意料之外地预测了 E 的存在,并且在以后的实验中,人们以 T 所规定的方式观察到了事实 E,那么,T 便经受了 E 的严格的检验。

检验严格性这一概念旨在对科学理论的价值作出评估。根据这一标准,一个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对既存知识中已知的事实作出新解释。一个在这一解释之前已为人们熟悉的事实对该解释不起检验作用。科学理

^① K. R. 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 232 页。

论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惊人的、出人意料之外的预测：它的内容在背景知识中显得不可信和不可能发生，但却在观察中被经验事实所确认。只有经受了这样严格检验的理论才对人类知识的积累有所贡献。因为假说一旦被严格的检验所确认，背景知识中与这个假设相矛盾的部分就要被排除，甚至背景知识会被新知识所替换，这意味着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

在波普尔的心目之中，严格检验的范例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检验。相对论中的一些结论，如光线弯曲，时间延长，空间缩短，宇宙膨胀等，在经典物理学的背景中，乃至在一般人的常识中，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它们都获得了某些观察证据的支持，使得相对论成为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理论，并修订了经典物理学。

然而，经典物理学也曾是经由严格检验的科学。海王星的发现就是对牛顿力学的一次严格检验。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和根据牛顿定律计算的结果相比有细微的偏差，这一事实似乎证明了牛顿力学的不精确。然而，英国的亚当斯(J. C. Adams)和法国的勒维里叶(Leverrier)根据牛顿力学作出预测，这一偏差是由于天王星轨道外侧的一颗尚未观察到的行星对天王星的引力造成的，他们计算出这颗未知行星的精确位置，不久，海王星的存在便由观察所确认。用同样的方法，人们又发现了冥王星。海王星的发现把对牛顿力学的威胁转变成牛顿力学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显示了科学理论预测未知事实的力量。

3. 确认度

如果说，可证伪性和检验的严格性这两个概念是

对科学理论之标准的定性分析,那么,确认度就是对科学标准的定量分析。

确认和证伪是同一个标准的正、负两面,“证伪”这一概念强调,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假设,最终都要被更好的假设所代替。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每一个“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止,它禁止某些事物的出现,一个理论禁止得越多,它就越好。禁止得越多的理论必将经受否认事例的更大冲击,因此也就越容易被证伪。“确认”这一概念则强调,如果一个假设在严格的、否认的考验之下仍然不被推翻,那么,它就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的价值。虽然它没有,并且永远不会得到最终的证实,但仍可以暂时被看作是迄今为止最合理的假说,波普尔把严格的检验力图否认,但暂时还没有被否认的理论称作对理论的确认。

“确认”这一概念虽然认可了一个理论的合理性,但它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确证”。波普尔用“corroboration”表示“确认”,以示与卡尔纳普所说的“确证”(confirmation)有别。两者的差别是量度的差别。确证度和概率成正比,它是衡量归纳法效果的尺度:支持一个理论的事例愈多,那么,表示这个理论真实性的概率也就越高。与此相反的是,确认度与概率成反比。用波普尔的话来说:“一个理论的可确认度——以及一个在事实上经受了严格检验的理论的验证度,可以说均与它的逻辑概率处于反比关系中;因为它们都随着它的可检验性和简单性程度的增加而增

加。”^①他的理由是：既然理论可检验的程度是可证伪的程度，那么，确认度较高的理论总是那些较容易地被证伪的理论。如果用概率来表示“容易被证伪”的程度，证伪的可能性高则理论为真的概率低，反之亦然。因此，一个理论的确认度与它为真的概率成反比。

如果我们用符号 $C(x, y)$ 表示事实 y 对 x 的确认度， $P(y)$ 表示事实 y 可能出现的概率，那么则有：

$$C(x, y) = \frac{1 - P(y)}{1 + P(y)}$$

这一公式表示了确认度和事实 y 出现的概率（亦即理论 x 为真的概率）之间的反比关系： $P(y)$ 的值愈大，则 $C(x, y)$ 的值愈小，反之亦然。

确认度公式是对前面所说的检验严格性的定量说明。 $P(y)$ 的值大，意味着背景知识对事实 y 的认可。这样的事实对新理论 x 的确认并没有多大意义。 $P(y)$ 的值小，则意味着背景知识对事实 y 的怀疑和拒绝。然而，一旦事实 y 以理论 x 所预言的方式被发现，它将对 x 的确认作出重大贡献。

4. 逼真度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波普尔说，他关于经验内容和确认度的观念是该书中最重要的逻辑工具。当时，他并没有认真论述关于真理的问题，这是因为他对“真理”这一概念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关于真理的各种传统理论都把真理看作是对于本质的揭

^① K. R. 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234—235页。

示。本质与理智的关系只有两种：不是显现，便是隐蔽；人的认识不是真理，就是错误。这种传统观念和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格格不入，而他自己又没有一个关于真理的成熟想法。因此，当他谈到“寻求真理”，“越来越接近真理”这些话时，心中不免忐忑不安。后来，他读到了塔尔斯基（A. Tarski）提出的真理的语义学定义：“P”是真的，当且仅当 P。根据这个定义，“真理与事实相符合”这句话满足了真理的充分条件，并且在形式上也是不可反驳的。塔尔斯基的定义帮助波普尔摆脱了困境。波普尔认识到，没有理由在知识论中不使用“真理”这一概念，也没有理由不能说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接近真理。真理的发现虽然不是一劳永逸，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理论接近真理的程度没有区别。“逼真度”的概念衡量理论接近真理的程度。而程度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逼真度是适用于两个理论相比较的概念，而不是对单个理论的评价。只有“确认度”才是适用于单个理论评价的概念。

设有两个理论 a_1 和 a_2 ，如果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我们便可以说 a_2 比 a_1 具有更高的逼真度。

(1) a_2 比 a_1 作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并且经受了更为准确的检验。

(2) a_2 比 a_1 说明了更多的事实。

(3) a_2 比 a_1 更为详尽地描述或说明了事实。

(4) a_2 通过了 a_1 通不过的检验。

(5) a_2 设想了 a_1 没有考虑过的实验，并且通过了实验的检验。

(6) a_2 把 a_1 认为是不相关联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科学发展史上，牛顿的理论比开普勒和伽利略

的理论具有较高的逼真度。因为前者比后者以更精确、更详尽的方式说明了更多的事实,并且把以前互不联系的天体力学与大地力学统一起来。虽然牛顿力学被后起的理论所反驳,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理论的优越性。因为牛顿力学通过了一些后者通不过、或者根本没有设想过的严格检验,并且,那些反驳牛顿理论的证据同样也反驳后者的理论。因此,即使在牛顿力学遭到反驳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和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理论相比较,在比较中肯定它的逼真度较高。

逼真度有着量的规定性。我们可以把遭到反驳的理论分成两部分:被证伪的部分和尚未被证伪的部分。前者称为理论 a 的“假内容”,用符号 $C_{IF}(a)$ 表示,后者称为理论 a 的“真内容”,用符号 $C_{IT}(a)$ 表示。 $V_s(a)$ 表示理论 a 的逼真度,那么则有下面的公式:

$$V_s(a) = C_{IT}(a) - C_{IF}(a)$$

根据这一公式,理论 a_2 的逼真度高于理论 a_1 的逼真度,而且仅当(1) a_2 的真内容超过 a_1 的真内容,或者(2) a_1 的假内容超过 a_1 的假内容。

引进了逼真度这一概念之后,波普尔得以更加圆满地解释科学知识进步的标准。前面所说的高度的证伪性、内容的丰富性和检验的严格性等只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但还不足以组成所需的充分条件。因为一个理论不论现在如何合理,总有一天会遇到它说明不了的事实和它通不过的检验,总会被事实所证伪。但是,只要这个理论比先前的理论有较多的真内容和较少的假内容,即使在它被证伪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肯

定它的逼真度,仍然可以把这一理论代替它之前的理论的历史看作是科学进步史、知识积累史。这就是说,逼真度这一概念在说明科学发展史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节 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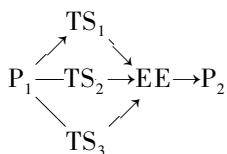
波普尔始终把科学知识的生长问题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对科学的界限以及性质作了证伪主义说明之后,他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如下所示:

$$P_1 \rightarrow TS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P_2$$

这个模式表示,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problem)。面临着问题 P_1 ,人们首先提出假说,作为对此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即TS(tentative solution)。然后,再对这一假设进行严格的检验,即通过证伪消除错误,即EE(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 P_2 。如此反复,问题越来越深入、广泛,对问题作尝试性解决的理论的确认度和逼真度也愈来愈高。根据这一模式,人类知识的积累应当被看作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

1. 优胜劣汰的模式

波普尔说,他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是达尔文主义的,而不是拉马克主义的模式。因为它强调的是知识的进化,而不是渐进。在上面的模式中,对一个问题的尝试性的解决实际上不止一个,它应作如下的修改。



在各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 TS_1, TS_2, TS_3, \dots 之中,存在着类似达尔文所说的优胜劣败的生存斗争。只有那些能够通过证伪的严格检验的方案,才能被保留在科学知识之中,其余则在消除错误的过程中被淘汰。当然,生存下来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它还要面临新的问题,经受新的检验,进化成新的方案和理论。

波普尔把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联系,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两者之间的联系向人们暗示,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人类智力活动,而且也适用于一切生物的活动。对波普尔的知识增长模式,可以作广义的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和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有关,狭义的理解只涉及他的科学哲学。我们将在第四章中阐明广义的进化认识论,在此暂将我们的理解限制在狭义的范围之内。

2. 非决定论的模式

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既是一个开放性的,又是一个非决定论的模式。正如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预测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人们也不能完全预测和决定科学知识的未来状况。他特别反对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18世纪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说,假如我们具有关于物体以及质点的位置和运动的充足知识和无限的数学运算能力,我们就能够精确地预测将来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波普尔反驳说,科学理论的尝试性和暂时

性意味着,现有的科学知识描述的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状态,而根据对过去状态的描述,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状态。波普尔的理由和休谟反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理由类似。两者都认定,在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之间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波普尔在一篇题为“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的文章中,为他的非决定论提出了三个论据。^① 这些论据的论点是:对未来知识状态的完全预测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论据叫做“特里桑的煽带酒之悖论”。特里桑(Tristram)是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他在护送国王的新娘前去成婚的路途中,和新娘一起误喝了一种神奇的“煽带酒”(Shandy,一种啤酒和姜汁酒的混合酒),他俩都能够感受对方的心理状态,因此坠入了不可分割的爱情之中。波普尔把他俩喝的“煽带酒”比作一架智能机器,它能够在任何时刻告诉人们,他们在将来某一时刻将处在何种精神状态之中。现在假设人们在时刻 t_1 给机器下达了预测他们在 t_5 时的精神状态的指令,机器在时刻 t_2 完成了预测。但是,这一预测是根据人们在 t_1 时的精神状态作出的,它没有考虑到人们在 t_1 至 t_2 这段时间中精神状态的变化。于是,机器在时刻 t_2 要以人们在 t_1 至 t_2 精神状态的变化为依据,对他们在 t_5 时的精神状态作出新的预测。但是,当这一预测在 t_3 完成时,人们在时间 t_2 至 t_3 中的

^① “Indeterminism in Quantum Physics and in Classical Physic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50), pp. 117—133, 173—195.

精神变化又未能被包括在预测之中。依此推延,只是到了 t_6 时,机器才能够知道人们在 t_5 时的精神状态,并且把他们在 t_4 至 t_5 这段时间内精神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也就是说,机器只有在将来之后的某一时刻,才能对将来时刻的精神状态作出“预测”。这是一个悖论。推而广之,任何关于将来知识状态的知识都是悖论。这一悖论说明,人不可能科学地预测他们精神生活之未来。

波普尔的第二个证据是“俄狄浦斯效应”。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刚出世时,先知便预言,他将来的命运是杀父娶母。为了避免这一预言的实现,他与他的父母都作了各种努力。然而,只是到了这一预言最终实现之后,俄狄浦斯才知道,正是这些防范预言实现的措施,成了促使预言实现的一个个步骤。这个故事从心理学角度说明了“特里桑的煽带酒悖论”中的逻辑道理,即,任何预测都要包含对预测活动自身(包括预测的步骤、方式和效果等因素)的考虑,而这一考虑又引起了一系列新的、没有被包括在原来预测内容中的预测。人们只有在被预测的事件发生之后,才能够完成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人们不可能在事前就对未来事件、状态作出完全的、精确的预测。

第三个证据是“哥德尔句子”。逻辑学家哥德尔(K. Godel)于1931年提出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演绎系统必定是不完全的,在完善的演绎系统之中,总不免有些定理和命题的真假是不可确定的。波普尔把这些定理和命题称作哥德尔句子。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演绎系统中,是否能预测哪些句子是哥德尔句子呢?设想一架计算机能够作出这

样的预测。然而,只有在对一个句子进行证明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之后,它才能断定该句子是哥德尔句子。在此之前,它不能预测其自身将来时刻的工作状态。波普尔认为,哥德尔句子在一个演绎系统中的存在与不确定性证明了知识对自身将来状态的完全预测在工作程序上是不可能的。

3. 非理性因素

波普尔在知识发展观中所持的非决定论观点是和他的证伪主义相一致的。预测是猜想和假说,要服从证伪原则。而证伪的证据和结果是不可能包含在预测的内容之中的。如果把科学理论发展的过程看作不断地对猜想和假设加以反驳和证伪的过程,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推论就是:任何对这一发展过程的预测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相反,它必须随时被修改、补充乃至推翻。

对于科学发展的过程,人们充其量只能预测它的总趋势,即知识的经验内容不断增加,越来越接近真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趋势。如果人们期待更多,想要知道为什么那些最不可信的假说最终会代替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理论,波普尔则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他说,我们过去在知识论中的胜利是“奇迹般地难以置信”,因此,它是不可解释的。它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的无穷系列上的环节。

波普尔对科学理论发展的非决定论解释也与他的进化论思想相关。一个假说之提出犹如物种的突变。成功的假设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这正如某些突变所

产生的物种能更好地适合环境一样。成功的假设代替旧假设犹如新物种代替老物种的物竞天择的生存斗争。以上这些相关类似蕴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关系：假说的诞生与突变的发生一样，都是盲目的，无规律可循。因此，理性无法引导假说的诞生，理论发明如同物种突变一样，是创造性的直觉的非理性的一蹴而就。有些人据此说，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归根结底是非理性的。波普尔自己却否认了这点。他在批评库恩关于范式的非理性的观点时写道：“说从牛顿的重力论到爱因斯坦的重力理论是一个非理性的飞跃，说两者在理性上不可比，都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两者有很多联结和相关点。”^①看来，波普尔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态度，既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亦此亦彼。我们对此要做更多的具体分析。

第六节 批判理性主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波普尔主张的批判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对理性批判功能的推崇。在他看来，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精神是理性的精髓。他说：“理性主义是一种愿意听取批判性论证和在经验中学习的态度。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态度，即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于真理’。”^②科学之所以是理性的原因是，科学

^① I. Lakatos and M.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8.

^②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证伪、批判,科学不服从任何权威,包括理论的权威。

1. 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

波普尔说:“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信赖’任何理论,因为没有一种理论已经被证明或能够被证明是真的。”^①他接着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科学是理性的。请注意:在此意义之外,“科学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一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悬而不决的问题。为什么呢?据他的解释,科学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尝试性方案;而且,这样的方案往往不止一个,我们必须选择。“由于我们不得不选择,那么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best tested theory)是‘合理的’。这将是‘合理的’,是在我所知道的这个词的最明显的意义上来讲的;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是根据我们的批判性讨论看来迄今为止最佳理论,而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很好进行的批判性讨论更‘合理的’了。”^②

在这段话里,波普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理性选择。第一种是选择确认度最高的理论;第二种是选择在实行中最有效的理论。确认度最高的理论在行动中不一定最有效,反之亦然。这是因为确认度和概率成反比,而成功的效果则和概率成正比。选择确认度高的理论意味着冒险。这个理论对违反科学家乃至一般人常识的事件作了成功的预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也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

能成功地预测常识世界里经常发生的事件。受理性支配的人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宁愿选择经受了最严格批判审查的理论,而不选择那些在实践中具有最佳效果的理论。因为检验理论的理性标准是批判、证伪,而不是实践效果。

批判理性主义不是彻底的、完全的理性主义。波普尔不像传统的理性主义者那样,坚持理性能够解释包括理论自身在内的一切现象。那种彻底的、完全的理性主义必然要陷入循环论证的圈套而失去其应有的理论力量。为了替自身的权利进行辩护,彻底的理性主义者构造出合理的理由、证据,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理性主义,而不选择非理性主义。这实际上预先已经设定了这样的原则:理性较非理性更为优越,合乎理性的思维比非理性的直觉、想象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这样的论证把有待证明的结论当作证明的前提,犯了形式逻辑中循环论证的错误,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思维方式。波普尔清楚地知道,他不能为自己的理性批判主义提供逻辑上的辩护。如果把理性看作是自身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在铸造反对自己的武器。如果有这样的理性标准的话,“它本身也不能为论证和经验支持,从而自己也应该被加以抛弃”。^①

出于上述理由,真正的理性主义不可能是全面的、彻底的理性主义。它不应当把理性自身,而是把能否批判和接受批判作为理性的标准。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理性主义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理性主义,它必然要和非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理性的因素掺和在一起。因为作为理性标准的批判主要是提出能够推翻现有理论的假设。但是,大胆的假设、出人意料、令人吃惊的猜测往往是创造性的直觉和自由想象的结果,并不完全合乎逻辑推理。波普尔承认:我们可以选择某些形式的非理性主义,甚至一些彻底的或全面的非理性主义。但是,我们还可以自由地选择一种批判理性主义。这种批判理性主义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起源于非理性的决定。在此意义上,波普尔说:“非理性主义在逻辑上优于未加批判的理性主义。”^①非理性主义在逻辑上优于彻底的理性主义,因为它不需要为自身存在的权利提供合理的辩护。它的存在这一事实便是对理性权威的挑战。彻底的理性主义却没有这种优越性,它必须,然而又不能够为自身权利作出合乎逻辑的理性论证。

2. 为什么要选择理性主义?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从彻底的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呢?波普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虽然容许用非理性主义对彻底的理性主义作必要的改造,但却断然拒绝彻底的非理性主义。他说,彻底的、全面的非理性主义比彻底的、全面的理性主义更为有害。后者只给人们的思维造成困惑与悖论,而前者造成的却是社会的祸害。

为什么我们选择理性主义而不是非理性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理性虽然不能提出合乎逻辑的答案,但却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能提出合乎人伦道德准则的答案。当我们的目光从事实判断领域转向价值判断领域,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优劣自明:前者意味着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人权平等的主张;后者的特征是专制、仇视他人的态度,把人的自然不平等固定为法律上的不平等。一言以蔽之,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理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同盟,非理性主义同时也是非人道主义、非自由主义。出于以上的原因,波普尔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并没有突出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知识论中,他的立场接近于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是,在社会政治哲学中,他却以理性批判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为轴线,展开了对开放社会的论证和对开放社会的敌人的猛烈攻击。

赵敦华讲

波普尔

第三讲

赵敦华讲

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伟大哲学家们不但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思想,也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观。波普尔哲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我们已经介绍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对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他的政治哲学和其他哲学家社会历史观的对立。不论在科学哲学,还是在政治哲学中,波普尔宣称,他的批判目标是共同的,即权威主义。传统认识论中的基础论是信奉确实不变的真理的权威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极权主义是信仰确定不变的历史规律的权威主义,两者都导致了排斥批判,反对变革的僵硬的教条主义。波普尔提倡证伪、试错等发展科学的方法,但是,在教条主义禁锢人们思想的环境中,这种科学方法行不通。他的科学哲学呼唤着一个开放的社会。他的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倡导和理性批判主义相适合的开放社会。

我们谈到,波普尔两本政治哲学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作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流行于战后东西方“冷战”时代。他的政治哲学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他所说的“开放社会”实际上指的是西方“自由社会”,极权或封闭社会主要指的是第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国家和苏维埃国家,以及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他自豪地宣称:“尽管我们存在种种麻烦,尽管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肯定不是最好的可能社会,我断言,我们的自由世界是至今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过的最好的世界。”^①波普尔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我们首先必须对他的论证、理由和思维方式有全面的了解,然后才能对他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有公正评价。

第一节 历史主义及其心理学根源

1. 何谓历史主义

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sm)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主要批判对象。他赋予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是,“以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律’、‘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②。据说,历史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人类的进程是一个谜,谁解开了这个谜,谁就掌握了控制未来的钥匙。历史主义的预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470页。

^②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言是人类发展规律之谜的解,按照历史规律设计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就是打开理想世界大门的金钥匙。简而言之,历史主义就是这样的信念,它认为存在着一条决定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且以预言和发现这一规律为其基本目标。历史主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理论。它的最古形式是“上帝选民论”,即认为上帝意志决定社会发展方向,这是“神学形式的历史主义”。此外,还有认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有认为思想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和认为经济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反历史主义。

2. 反历史主义的论证

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序言中,波普尔声称,他已经找到了反历史主义的逻辑证明。他通过严格的逻辑思考已经证明,我们不能预言历史未来进程。他的论证分五个步骤。

(1) 人类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 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和科学的方法预知科学知识未来的增长。

(3) 因此,我们不能预知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建立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存在类似于理论物理学史的社会科学。因此,在历史预测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5) 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根本目标乃是错误的。历史主义坍塌。

这一论证的关键是步骤(2)。它来源于波普尔关于知识积累的非决定论思想。历史主义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即认为历史进程为一定的规律所支配,人们可以完全地、精确地预见历史的未来进程。波普尔反对历史主义的逻辑论证是他关于知识进化的非决定论的深化与发展。

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简单类比推理:既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通过预见自然进程来控制 and 改造自然,那么,也应该存在一种历史科学,它的目的是发现历史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来改造社会。波普尔不同意这一类比的原因是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预测——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和对社会历史现象的预测。波普尔不反对说自然现象是有规律的,但却不承认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律性。

为了说明自然科学的预测和历史主义的预测之间的差别,波普尔作了如下区分。首先,预测的范围有整体和局部之分,长期和短期之分。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逐步增加,证伪度也随之增高的过程。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理论不可能对整体作出长期的预测而不被证伪。因此,科学理论预测的范围或者是短时期内的,涉及全局现象,或是长期发生的局部现象,但长期与整体两者不可兼得。而历史主义者却偏要发现既适用于人类社会整体,又决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规律。这种意义上的规律是不可证伪的。它没有证伪度,因而也就不是科学的规律。

其次,自然科学预见必须经过事实的严格检验。

事实检验存在于事实按预测的方式重复出现的过程之中。然而,历史主义的预言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检验。社会中的事实千差万别,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制约,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次性的。我们不能采取科学实验的方法,在社会中设计一个理想的环境,排除偶然因素,让历史事实重复出现。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实验定的条件不同,任何关于历史发展的预言都不可能被事实所确认,它不可能经过严格检验而被上升为科学规律。

波普尔否认存在着与自然科学规律相对应的历史规律,但他并没有否认存在着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科学。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它能够运用证伪原则和试错法。由于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之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它的任务是解决当前面临的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它提出的预测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只在短期之内,在具体环境之中才适用。企图制订出大规模地改变社会的长期规划和企图发现历史规律一样,都是违反科学的乌托邦式的想法。波普尔把有关社会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分为两种:乌托邦工程和渐进或零星的社会工程。前者是历史主义的伪科学,后者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

3. 历史主义的心理根源

波普尔的批判并不停留于对历史主义的反科学性质的揭露。他承认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历史主义的普遍倾向。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普遍接受了历史主义的信念,把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当作确实的真理。在自然

科学体系建立以后,人们又企图给历史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这一事实说明,历史主义虽属伪科学,但却不是浅薄的、无根据的无知妄说:相反,它有深刻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根源,才得以盛行几千年而不衰。波普尔接着挖掘了历史主义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在其晚期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一反传统的人性论的说法,认为人并非生而自由,追求自由并不是人的天性。相反,人的本能需要首先是安全和庇护。儿童在家庭的庇护之下得到了安全感的满足。人类在其童年时代是在血缘组织中获得安全感的。人们需要一个严厉而又仁慈的父亲般人物的庇护和照料,以求摆脱心理上的恐惧感,包括对黑暗、死亡和陌生人的恐惧,也包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对未来,对一切未知事物的恐惧。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是出于摆脱恐惧感、寻求安全感的需要而出现的。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血缘关系逐渐松懈,部落和家族的庇护也靠不住了。人在成年之后,就被抛到社会,面对陌生的人群和未知的将来。人有了相对多的自由,但是,自由意味着缺乏他人的保护,意味着人必须对自由选择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责任感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负担、压力,甚至恐惧,这就是“文明的张力”(strain of civilization)。

波普尔虽然把弗洛伊德的学说称为伪科学,但他对历史主义根源的心理分析,与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张力”的观点不谋而合。波普尔把人类初期的部落社会称为“封闭的社会”,它的特点是权威崇拜。人们为了满足心理上的安全感,对家长的意志,传统的习俗,宗教的仪式等唯命是从。对权威的怀疑和批判都

被视为大逆不道。封闭的社会缺乏内部活力,又不能接受外来的动力,因此,形态落后,发展缓慢,容易被历史所淘汰。即使在开放社会中,文明的张力依然存在。人们以牺牲安全感为代价换取自由,以牺牲自我尊严为代价换取平等,以牺牲心灵平静为代价换取批判的权利,这样才能产生社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屈从于人性中守旧、懒惰、贪图安逸等倾向的人,经受不住文明的张力,他们对自由和批判抱有本能的反感,对能够给予他们安全和庇护的任何权威有着本能的爱好。在波普尔看来,那些对灵魂不死作出承诺的宗教信条,对真理的确证性作出承诺的知识论以及对尽善尽美的未来社会作出承诺的历史主义,本质都是借用一个权威(神,知识基础以及历史规律),给人以心灵上的安慰,使他们摆脱对死亡、陌生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恐惧感。思想上的权威主义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开放的社会面临着强大的敌人,有倒退到封闭社会的危险。因此,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以反对封闭社会的复辟为己任。他把所有历史主义者都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并对历史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性的阐述。

第二节 历史主义的哲学传统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用哲学史的材料来反对历史主义的著作。根据波普尔的理解,历史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它与西方哲学同时诞生,并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全过程,在现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这部书的上卷的副标题是“柏拉图的魅力”,下卷

的副标题是“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从这些标题就看出，波普尔攻击的重点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下面就是波普尔这种哲学史观的一幅图画。

1. 历史主义的开端

历史主义的始作俑者据说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赫拉克利特处在古希腊社会由部落集团向民主政体过渡的时期。他出身氏族贵族，站在贵族的立场，扬言要把一个自由城邦中所有人都吊死，宣扬“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他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为后来的历史主义者所推崇的“规律”的概念。规律即“逻各斯”，它是控制变化的永恒力量。

柏拉图也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反对在雅典实行民主制，一生都在为恢复贵族统治而努力不止。在他看来，民主意味着不分贵贱、寡廉鲜耻、崇尚诡辩、诉诸暴力、沉湎享乐等弊端。柏拉图把所有政体分为四种：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君制，其合理性依次递减。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暴君制是最坏的政体。他警告雅典人：如若不放弃民主制，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接受暴君统治。他的贵族制主张体现在“理想国”的蓝图中。柏拉图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了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他的历史主义哲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念”统摄变化的保守主义立场

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完美的原型。恪守、保持和效仿原型才是事物存在的本质。

社会政治制度的原型是贵族制。然而,这一原型却在历史的变动中遭到了破坏和歪曲,逐步堕落成为其他不完善的政体。

柏拉图具体地描述了这一堕落过程。贵族们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但也有过分看重尊严和荣誉的虚荣心。虚荣心导致贵族家族之间争相炫耀。为此目的,贵族们转而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最富有的贵族成功地排斥了其他贵族独揽大权,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寡头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触发了贫民反对寡头的革命。贫民革命建立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民主制。因为缺乏公认的权威,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于是转而拥戴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维持安定,民主制遂导致暴君制。柏拉图的故事告诉人们,离开理念原型的变化总是沿着从优到劣的方向进行的,是堕落和危险。因此,他鼓吹返回到政治制度的原型——贵族制,并且排除贵族制中不安定的因素,使之成为一个不会再有变化的“理想国”。

(2) 乌托邦工程

“理想国”是柏拉图为雅典社会设计的蓝图。因为贵族们聚敛财富是促使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的原因,理想国的统治者将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也不准用金银宝器。他们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家庭,配偶不固定,子女由国家抚养。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虽然它可以在当时军事贵族制的斯巴达国家中找到雏形,但它实属柏拉图所说的“理念”范畴。对理想国的描述是对尽善尽美的理想的追求,它的实施也需要一种以激情和迷狂为特征的极端态度。在善与恶之间没

有其他的选择：或者为实现理想而献身，或者过着无价值的生活；或者对社会进行全盘改造，或者任其堕落到黑暗的深渊。逐步的进化和改良之路是行不通的。

（3）整体主义的伦理观

“理想国”由三个等级组成。执政者以智慧管理国家，武士以勇敢捍卫国家，劳动者以勤劳供养国家。正义就是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干扰。相反，如果三个等级互相倾轧，企图取代其他等级的地位，那就是最大的祸害。等级森严、禁止僭越是封闭社会的戒律。它规定，每一个人在整体中都有相应的位置，个人的价值和作用由整体决定。自主地追求个人自由和价值破坏了整体的和谐，被指责为不正义和不道德的行为。开放社会的原则是竞争，鼓励每一个人竭力取代他人的位置，主张个人主义的道德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对立，却不与利他主义相对立。和利他主义相对立的是唯我主义。波普尔争辩说，个人主义不等于唯我主义。开放社会的道德是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综合。

（4）自然主义的人性论

为了替“理想国”的等级观念寻找根据，柏拉图编造了一个神用不同金属造人的神话：执政者用金子制成，武士用银子制成，农人和手艺人则用铜、铁制成。一般说来，子女和父母属于同一等级。但是，只有在一年中某一特定时期生育的孩子才是纯种。这个特定的生育期是一个神秘的数。统治者由于不懂得这个数，在不适合的时期生育子女，结果造成了种的混杂，

在金、银中掺杂了铜、铁。一日，混种人作为统治者的后代继承了政权，贵族制便堕落、蜕变为其他政体。

柏拉图承认，这番话是神话。但是，他在神话中却向人们传达了一个后人不容忽视的观念，即，人在自然属性上的不平等是人在等级上贵贱之分的依据。所以，有些历史主义把历史规律归结为生物学规律，他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汲取血统论和种族主义的成分。

(5) 极权主义的政治理想模式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模式。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极权主义者都以“理想国”为蓝本，而是说，他们都在柏拉图的模式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柏拉图的中心问题是：谁应当统治？他的结论是：哲学家应当作王。后来的政治哲学家没有采用柏拉图的结论，但却使用不同的语言回答了柏拉图的问题。中世纪流行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只有获得上帝恩准的人才有资格统治。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者说，只有代表国民意愿和利益的人才能统治。现代的历史主义者则说，只有高贵的种族或阶级才应当是社会的主人。这些说法的本质都是极权主义。它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谁应当统治”本身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预先设定，国家的前途是受历史规律支配的。解决“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回答“谁掌握了这一规律”。由此可见，历史主义早就和极权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6) 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之教育观

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国家大事中最大的事”。教

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保证理想国永世长存。他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程序,对统治阶级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智育和体育双重训练,并从中挑选出优胜者作为接班人,保证贵族制度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虽然不乏合理因素,但它的基本思想是将教育当作贵族们的特权,当作政治的工具。这种教育观在实践中遇到不可解决的矛盾。为了培养能够继承和贯彻现在统治者意图的接班人,教育必须灌输不容置疑的教条,培养学生服从权威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它又必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的精神和创造能力。自由和创造是活跃的思想的本性。最有才智的学生总与教条式的教育格格不入。以培养接班人为宗旨的教育制度企图保证统治者在精神和体力上的优势,但它培养出来的却只能是唯唯诺诺的庸才,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柏拉图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源泉。本世纪美国哲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甚至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波普尔发现的是柏拉图对后世政治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历史主义的所有观点都可以在柏拉图主义中找到出处。他把与柏拉图齐名的另一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成是历史主义者。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概念作了重大修改:理念不是高踞事物之上,而是贯穿于事物发展之中的稳定型式。这一修改也改变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理解,它要求人们不要在社会之外去寻找历史规律,而是肯定历史规律即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界发展过程中。在中世纪,即使人们普遍接受了上帝意志是社会

变化的终极原因等信条，神学家和哲学家们也还是根据自然界自身性质来解释历史规律。他们说，上帝的意志不是一个随意的概念，它体现在自然规律和事物的目的之中。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本质特征是等级、秩序和目的。

2. 黑格尔的新部落主义

黑格尔建立起了哲学史上最为完备的体系。波普尔对黑格尔哲学却充满厌恶、鄙薄之情，斥之为逻辑混乱、武断专横的满纸空言。他借助黑格尔的论敌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德国文学的所有形式上都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更严格地说，一种麻醉人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瘟疫般的影响。随时对这种影响进行有力的反击，是每个能够进行独立判断的人的责任。因为如果我们沉默，还有谁来说话呢？”^①这段话虽然充满偏激态度，但却表达了波普尔的立场，他赞成叔本华的判断：在严肃的理论家看来没有多大价值的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能够显赫一时，是因为它靠政治权威的扶植，而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哲学”。黑格尔哲学迎合了普鲁士国王建立文化霸权之需要，这也是一个专制制度抵御英国自由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精神之需要，是封闭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开放社会的反扑。因此，波普尔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新部落主义。黑格尔的新部落主义的核心是“国家至上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普鲁士国家至上论”。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他的绝对唯心论说,思想、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服从于绝对观念的辩证法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客观化的绝对观念在国家中达到了世界精神的最高阶段。支配世界精神运动的就是历史规律。根据历史规律,世界精神经历了东方国家,希腊、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三个阶段。日耳曼国家的最高形式是普鲁士国家。在这里,世界历史发展到了顶峰和终点。在黑格尔著作中充满了对国家的狂热崇拜和赞美:“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观念”,“我们必须把国家当作地上的神灵来崇拜”,“国家是上帝在世界中的进军”,“国家为自身而存在”,“国家是实现了的、现实存在的道德生活”,是“伦理精神的现实”,是“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等等。黑格尔也曾谈到思想自由,但又毫不含糊地规定:“思想自由和思想才干在国家中产生”,“科学必须寻求国家保护”,“国家必须决定什么是客观真理”。

德国法西斯主义和黑格尔宣传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直接联系。所不同的是,法西斯主义把黑格尔哲学中思辨的世界精神规律转变为种族进化规律,在唯心论中添加了血统论。法西斯主义对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继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黑格尔把国家当作民族精神的体现,法西斯主义进一步把国家的民族性归结为种族血统。

第二,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民族精神斗争的历史,一个国家是另一个国家的天敌。国与国之间的争执只能用战争解决。在战争中,国家不负任何道义责任,胜负是历史的唯一仲裁者。战争还是保持民族精神健康的道德净化剂。这种“战争合理论”是法西斯

发动侵略战争的依据之一。

第三,黑格尔鼓吹英雄崇拜,把英雄和领袖说成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和人民的“灵魂领导者”。群众只有跟随英雄和领袖等世界历史人物,才能把不自觉的追求变成有目的、有意义的壮举。法西斯的“元首中心论”和煽动群众狂热的英雄主义,与黑格尔的这些思想一脉相承。

3. 马克思的科学的历史主义

波普尔最后把矛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把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右翼和左翼。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吸收了关于辩证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并把“规律”概念的意义从唯心论颠倒成唯物论。历史规律不再是世界精神的规律,而是物质生产的规律。历史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发展,分别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包含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还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迄今理论中最纯粹、影响最广泛,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所具有的幻想的、宗教的、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色彩,它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并且援引了科学中的事实来说明历史主义。使波普尔最感不安的正是马克思历

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他于是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否具有科学真理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否定回答构成了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焦点。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与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不同，波普尔对马克思表示敬佩之情。他说，马克思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最无耻、最残酷的时期。马克思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社会中的不正义现象充满着义愤，对被压迫和损害的人充满着火热的同情。他的性格真诚、开放、容不得虚伪和欺骗，尤其憎恶剥削制度的辩护士。波普尔还承认，马克思研究和著述的态度是科学的。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思想者，包括那些不同意马克思理论的思想者，都受惠于马克思。按照波普尔的说法，马克思的愿望是改进开放社会，他使用了试错法来批判资本主义，但却没有成功。然而，马克思的尝试没有白费气力，他帮助人们睁开或擦亮了眼睛，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现在，再想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攻击马克思呢？波普尔回答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使得历史主义获得了科学的形态。他尽管有功绩，但仍然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诱导无数有识之士相信，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作出历史的预言，并为用暴力手段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提供科学上的论证。

波普尔把 20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归咎于马克思的错误预言。但是，他也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同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认为后者才是不可证伪的、伪科学的教条。波普尔的批评所针对的可以证伪的、因而是科学的马克思本人的理论。

1. 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被说成是经济的历史主义,被分成两个基本部分: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经济主义说明社会的性质、结构和变化原因,历史主义在此基础上揭示历史规律,预示社会发展的前途。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人的社会存在归结为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的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法律、上层建筑。波普尔所说的经济主义指的就是这些观点。他承认,把人的经济活动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提醒人们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不要忽视经济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过分认真地强调经济作用的基本性,以至于把经济条件夸大成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错了。在一定环境中,思想、特别是科学思想的作用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设想整个经济体系全被摧毁,但只要科学技术知识没有被摧毁,那么,经济体系在较短时间内便可被重建起来。可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假如知识完全消失了,而机器和物质产品仍然保存着,那么,结果只能是一个野蛮的种族占据着一堆工业化废墟的荒芜景象,文明的物质痕迹也会很快消失。第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方面思想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人们即使不知道经济背景,也能够研究某一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试图说明,思想、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却不是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人们只有首先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才能从事科学、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经济、物质条件是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波普尔却认为恩格斯只不过重复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这种“吃饭哲学”不足以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

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导致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结论。波普尔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事实,但又说,在上述命题中,不必过分认真地强调“一切”这个词。因为很多历史事实不见得能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比如,中世纪教会与国王的斗争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但这一斗争的性质却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同样,世界历史中绵延不断的民族斗争,也不都能被归结为阶级斗争。历史是各种力量和因素互相制约和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把它简化为两种力量的斗争,恰恰是历史主义的特征。神学形式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上帝与撒旦,善与恶之间的较量;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种族之间的斗争史;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是理性与偏见、启蒙与偏见之间的矛盾。波普尔说,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把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并不比其他形式的历史主义更高明。

波普尔反对经济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主义的一个基本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波普尔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把政治权力视为基本的。从这种观点看,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

“从这个观点看,政治权力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权力及其控制就是一切。”“由于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政治民主也就成了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力的唯一手段。”^①。

2. 暴力革命理论批判

波普尔之所以如此强调政治决定经济的作用,是为了用改良主义的方案来证伪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波普尔承认自由资本主义(laissez-faire)的非正义性和反人道性。在资本主义初期,“对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空洞口号。因为人们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教育水准、实际收入乃至体力、智力上的差异,竞争的起点实际上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这些由历史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造成的不平等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发展,势必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弊病。但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社会弊病的根源;根源在于没有对自由竞争中自发的、盲目的经济力量加以限制。然而,缺乏限制并非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任何社会都有不加限制的权力,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他权力更危险。另一方面,任何权力都是可以制约的,经济权力也不例外。在经济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金钱可以贿赂,可以买枪、买选票,从而可以左右政局。但是,法律制度、政治手段和舆论界可以对经济权力进行限制。比如,制订和实施了选举法、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02页。

劳工法、工会法、治安法等,金钱就不再是万能的了。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也可以限制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马克思的学说适用于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却不适用采取了经济干预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

3. 错误的预言

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预言称为历史主义的错误预言。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论是,这些矛盾只有靠生产资料公有制解决。波普尔承认,马克思发现的自由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确实存在,但它们却不一定非得用变革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运用政治权力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良或修补,也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针锋相对地反驳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公式,他的反驳分成下面三个环节。

(1) 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不过证明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因此,继自由资本主义之后,经济干预主义成为时代主流。但是,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措施,都是干预主义。马克思著作中提出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西方国家在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情况下,依靠国家政权的干

预,已经把这些纲领的大部分付诸实施。比如,征收累进收入和继承税,实行交通、通讯国有化,提高企业国有化程度,实行教育机会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波普尔说:“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制定法律限制剥削。我们可以限制工作日,……可以给工人提供伤残、失业和养老保险。”^①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去做的。波普尔以此说明,工人阶级的利益用社会改良和民主手段,而不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就可得到改善。

(2) 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

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的状况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垄断化倾向,将把大批小生产者和破产的资产者抛进无产阶级队伍,社会成员将被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而无产阶级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障。但是,事实与这一预言相反,民主制度的发展和经济干预主义在富有阶级和贫困阶级中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以贫困阶级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发动。马克思主义者在暴力革命问题上态度不一致。温和派力争用合法斗争夺取政权,激进派要以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波普尔注意到,恩格斯向敌人提出了挑战:“放第一枪吧,资产阶级的绅士们!”^②他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252页。

的策略是迫使资产阶级打响第一枪,以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促使革命早日爆发。波普尔目睹了这一策略的失败,第三国际政党诉诸街头的过激行为,把原来持中立立场的中产阶级推向右转,导致法西斯主义上台。法西斯主义摧毁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也同时摧毁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激起无产阶级的大规模抵抗。波普尔的结论是,无论是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那是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中取得的,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

(3)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两大严重后果:首先,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的矛盾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次,财富的集中趋势造成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矛盾最终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波普尔说,这些矛盾只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才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现在的国家干预主义已经或正在缓和这些矛盾。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可以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推导出来。生产过剩造成剩余价值下降,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的增长引起利润率下降。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资本家用减少工资或裁减雇员的方法,把危机转嫁给工人。波普尔指出:“价值理论证明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完全多余部分;这独

自地提出了价值理论是否真实的问题。”^①即使退一万步说,价值理论是真实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在国家的干预下,制订了限制工时,保证最低工资额,保障失业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法律,成立了保障工人福利的工会,剥削已经受到限制,童工、劳动折磨和工人生活无保障的现象逐渐得到克服。工人实际收入提高引起了社会购买力的提高,阻止或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同时,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新产品的开发,使得资本家即使在增加可变资本的情况下,仍可获得高额利润,无需用降低可变资本的方法来获利。

波普尔认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也已经过时,因为工人的生活水平从马克思时代以来已经普遍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有增长趋势。马克思当时观察到的资本集中和财富积累趋势已为国家立法(如所得税法、遗产税法、反托拉斯法等)所阻止。马克思关于工业后备军的理论也因为国家采取了失业保险措施而失效。在波普尔看来,这些事实已经证伪了马克思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惟其能被证伪,所以它曾经是科学的理论,只不过这一科学理论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②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② 同上书,第299页。

第四节 乌托邦工程和渐进社会工程

波普尔说,历史主义者“希望他们能够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社会科学转化为政治家手里的一种强大的有力的工具。”^①历史主义不仅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而且是安邦治国的一种方法;它绝不是无害的书生议论,而是统治者手中的锐器。在实践中的危害表现在,它依据自己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提供了改造社会的通盘计划。波普尔把这种通盘计划之制订和实施称为乌托邦工程。历史主义者大抵都是乌托邦工程师,历史主义者预言变化的规律,乌托邦工程师按照这一规律,力图严格控制并积极实现这一变化。

1. 乌托邦工程批判

乌托邦工程师并非邪恶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改造社会的目的并非谋求一己一派之私利。波普尔反对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个人邪恶念头的社会阴谋理论。社会阴谋理论不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一味追究政敌的主观动机。希特勒编造的犹太人企图毁灭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性阴谋,即是社会阴谋理论的一例。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论断看作是社会阴谋理论的另一个例子。社会阴谋理论从根本上排除了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用理性的对话,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他们

^①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之间分歧的可能性。如果争论是由于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引起的,那么,解决争论的最好方法将不是使用“批判的武器”来争论,而是使用“武器的批判”,用暴力去摧毁对方的利益。

乌托邦工程不是出自社会阴谋,相反,它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他们认为,历史朝着至善至美的目标发展:政治家的任务是顺应这一历史规律,创造一个美好、完善、充满人道、无阶级差别的大同世界。他们的信念可以用“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理想来概括。但是,波普尔说:“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①它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和不幸”。为什么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乌托邦工程师自认为自己的目标是理性的,但它的实质却是唯美主义。世界之于乌托邦工程师犹如作品之于艺术家,它必须白璧无瑕。“他们头脑中想到的非常类似于画在画布上的一幅画,在画一幅新画之前,必须把画布擦干净。”^②为了寻觅这一未来的天国,他们企望政治奇迹的出现。浪漫主义的狂迷激发出非理性的态度,比如,暴力、镇压、内部倾轧。因此,乌托邦工程虽然以理性的目标和计划开始,却必然以反理性和无计划的混乱状态告终。“乌托邦的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它的目的如何仁慈,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而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② 同上书,第313页。

只是那种生活在专制政府之下的可诅咒的常见的苦难。”^①

乌托邦工程的反科学性,表现如下。

第一,乌托邦工程的目标,诸如人性的完全解放,绝对的平等和正义,是抽象、遥远、不确定的。人们很难通过理性讨论来澄清它们的意义。在现实政治中,它们和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作出的决策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它们又可以为一切行为进行辩护。人们可以用自己长远目标的正义性来为自己时下采用的卑劣手段辩护。把“为了达到合理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当作信条。

第二,“最终目标”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目标”是相对于行为的概念。既然行为是具体的,目标也应是具体的。具体的目标在实施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困难和障碍;或者在这些目标达到以后,又随之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目标都需要不断的调整和修正。然而,“最终目标”这一概念却排除了目标的具体性、相对性和可变性。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第三,即使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最初对他们的最终目标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漫长时期内,他们必然会遇到新的事实和问题,必然会产生意见分歧。为了维持对“最终目的”的执著不懈的追求,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会演变为猜忌、敌对、不宽容,对不同意见的禁止和对待不同政见者的迫害。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第四,乌托邦工程的基本构想是,社会和政治组织构成一个整体,只有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才能改变具体和个别的社会状况。这种总体主义的看法导致了一揽子计划。总体主义要求权力的集中,要求牺牲个人自由,要求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涉。乌托邦工程最后导致了新的奴役和不平等,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波普尔因此说:乌托邦工程“继续不断地引导乌托邦工程师做他并不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它导致了一种声名狼藉的没有计划的计划现象”。^①

2. 渐进社会工程的合理性

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方法不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预言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是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试错法。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控制社会整体,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地、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病。这就是美国法律学家罗斯科·蓬达(Roscoe Pound)提出的“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概括地说,波普尔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渐进社会工程”的科学性。

(1) 排除痛苦,而不是增加幸福

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目标是科学的,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排除痛苦”,而乌托邦工程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表面上看来,“排除痛苦”和“增加幸福”似乎是同一目标的两个方面。因为

^①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痛苦”是“幸福”的反义词，人们可以把“幸福”定义为“缺乏痛苦的状态”。这样的文字游戏诱使人们相信，“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和“最大限度地排除痛苦”两种提法含义相同。语言分析的方法把“幸福”和“痛苦”从人的实际体验中抽象出来加以比较，却忘记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体验。它们并不是同一体验的正、负两面，而是独立的、一个不能补偿另一个的身心状态。事实上，幸福非但不能补偿痛苦，也不能被归结为缺乏痛苦的状态。波普尔说：“从伦理学的观点看，在苦难与幸福，或痛苦与快乐之间并不存在着对称关系。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和康德的‘增进他人幸福……’原则，在我看来，两者在这一点上都是根本错误的。”^①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问题，排除人们的痛苦是比增加他们的幸福更为直接和迫切的道德要求。中国人常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也就是这个意思。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排除痛苦的标准是明显的、确切的，但却没有一个增加人们幸福的确定标准。这不仅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且因为人们对利益得失有着不同看法。因此，人们对痛苦的各种形态、产生原因以及消除办法有着明确的认识。幸福的状态却千差百异，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并且新的享受和幸福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亲密关系的人之间，一个人才会知道如何有效地增加另一个人的幸福。但政府却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用行政手段建立和增加人们幸福的做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注①。

法,不但会把幸福的形态简单化,造成生活单调乏味,而且还会用公共权力干涉公民的私生活。波普尔说:“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让人们快乐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种。”^①他还说:“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简言之,我的论点是,人类的苦难是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的最紧迫的问题,而幸福不是这样的问题。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去努力。”^②

波普尔的这些结论保持了自由主义者的基调:人们各自寻求自己的幸福,政府则为他们铲除弊害。不难看出,波普尔把社会科学和政府政策的任务由增加幸福转变为消除痛苦,与他把自然科学的任务由揭示真理转变为消除错误的做法相一致。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都不会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排除和克服假、丑、恶的现象,逐步地取得进步。渐进社会工程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逐步地改良社会的途径。

(2) 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

渐进社会工程符合科学实验的程序。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假说和猜想,也必须通过事实的证伪性的检验。但是,检验社会科学理论的场所是社会,而不是科学实验室。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历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②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页。

史现象的不可重复性给社会科学理论的检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应付这些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应当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力图只与单个的、短期的社会条件与环境相关,能够不断地被事实所调整、修正或否证。这样,人们才能在反复试验的过程中提出更为精确、更有成效的方案。渐进的社会工程的优越性在于它的试验性。然而,它的渐进性并不意味着只顾眼前、抱残守缺和琐屑平庸,它亦需要蓝图,亦可触及社会重大问题。但和乌托邦工程不同,它的蓝图比较简单,只涉及个别制度、机构和程序,如改进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改变法院仲裁程序,修改财政预算和改善教学制度,等等。这些方案的利弊在短期内便可察觉,可以据此及时确认,或修改、调整,或废除方案。而乌托邦工程却不能以这种实验性的方法加以控制。它的目标或者过于遥远,使得短期行为无法检验它,或者过于庞大,在实践中造成无法收拾,不可挽回的损失。

渐进社会工程采取的是合理、可行的方法。它主张用温和的、改良的方法达到目的,用循序渐进的谨慎态度避免社会动荡和暴力破坏。同时,它尊重历史、保留了文化传统。乌托邦工程师的行为则好像是彻底清洗社会这块画布,相信在一张白纸上才能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追求一揽子成功的暴力革命却常常导致粗陋、混乱和倒退。渐进的社会工程和乌托邦工程的区别不是在改革的规模、速度和范围等问题上的区别,而是合理、谨慎、逐步、自我批判、建设性的态度和方法,与不合理、冒险、激烈、排斥异己、破坏性的态度和方法的区别。一言以蔽之,是批判理性主义和教

条主义、科学精神和权威崇拜的区别。

第五节 开放的社会

在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乌托邦工程与渐进社会工程相对立的基础上，波普尔又提出了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社会这两个对立的观念。这两个概念源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 Bergson)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起源》一书。封闭社会是以忠诚和顺从为准则，符合法律、习俗的静态社会。但波普尔说：“关于这两个词的使用，在我和柏格森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①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开放社会就是现代的民主社会，其特点是批判式的自由创造；而封闭社会是部落式的社会的残余，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都表现为极权社会，其特点是不加批判地盲从习俗，众口一词，舆论一律。封闭社会像一个囚笼，生活在其中的人缺乏理性批判能力，也没有自主意识和个人责任感；而开放社会的特点是相信理性与自由，它的成员有责任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且为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人们的分歧和矛盾通过辩论和讨论来解决，不同意见受到尊重和鼓励，政府的政策受到公众的监督和经验的理性的审视。笼统地说，开放社会的原则是批判、民主、自由和宽容。

开放社会的这些原则对现代人说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并不是大多数人都理解了这些原则的意义。相反，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贯彻这些原则往往造成一些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注。

悖论。这些悖论暗示,开放社会的理性原则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危险。波普尔以解决悖论的方式论证开放社会诸原则,其目的在于强调,理性的原则也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

1. 主权的悖论

如前所述,自柏拉图始,政治哲学的传统问题是:谁有资格统治?主权应归谁所有?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却摆脱不了悖论。设想人们最初的回答是:智者应当成为统治者。真正的智者具有自知之明,知道统治者的最重要品质是贤德。因此,智者的回答是:贤者应成为统治者。真正的贤者必然会施惠于民,把主权交给人民。但是,大多数人会否定自身的权利,坚持把主权转让给智者和贤者。苏格拉底早就告诫说,无论善良者还是睿智者,都是“脆弱的人”。“谁应当统治?”这个问题只能由强者来解决,而这个强者恰恰就是最不当统治的人——暴君。这无疑是一个悖论。

波普尔指出,解决悖论的方式是改变产生悖论的问题,即“谁有资格统治?主权应归谁所有?”这些问题以错误的方式提出了关于主权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在“主权等于最高统治权”的前提下被提出的。根据传统的观念,国家主权是一个完整的实体。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权力超乎其上或与之平行。并且,主权被奉为某个集团、阶层或个人独享的“神器”,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圭臬。根据这种主权观念,谁拥有了主权,谁就在政治上占有了统治其他人的特权。“他们假定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统治权。如果这一假定成立,那么所剩下的唯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谁应当

是统治者?’”^①波普尔说,这个前提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权力都是可以分割的。权力的分割即是权力的制衡。事实上,即使是最专制的君主,他的权力也不得不受其臣仆们的掣肘。虽然一切权力都受制衡,制衡的方式却有两种:一种是民主政体,一种是专制政体,“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别是:在民主政体下,可以不流血地推翻政府;在专制政体下则不可能。”^②。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下,权力的制衡表现为权力斗争,采取了流血的暴力和你死我活的激烈方式。在民主制度下,权力的制衡采取了普选、监督、辩论和协商等合理而温和的手段。政治哲学应该探讨什么是权力制衡的最佳形式、如何以损失最小的方式达到目的等问题。它不应在权力和人的关系问题上作文章,而应当探讨权力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它的中心问题不是“谁应当统治”,而是“如何最有成效地防止暴政”。不难看出,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的转换,与波普尔把社会科学的目标由“增加幸福”转换为“避免痛苦”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实行问题转换的意义在于,当主权的问题以“谁应当统治”的方式被提出,它的解决在理论上引起悖论,在实践中则导致以夺取权力为目标的暴力革命。民主政治的问题是:“我们用这样的组织政治机构才能避免无能力的糟糕的统治者带来太多的损害”。^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政治哲学所需要的,只是逐渐建立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

②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③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民主制度的渐进的社会工程。

2. 民主的悖论

这是一个和“主权的悖论”相关的悖论。“主权的悖论”产生于大多数人民所具有的不愿意担负管理的责任、需要强者保护的倾向。“民主的悖论”是在大多数人同意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的情况下产生的。试问：信奉民主制度的人应该服从大多数人推举出来的独裁者吗？如果不服从，那么他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不民主的；如果服从，那么他就得接受独裁统治，抛弃他信奉的民主制度。这又是一个悖论。

这一悖论是由于对民主的不正确理解而造成的。波普尔说：“我并不是用民主去意指某种诸如‘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之类含糊的东西，而是指一套制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普选，即人民有解散政府的权利，……）无须使用暴力，即使是违背统治者的意志，也能实现改革。”^①他还说，民主的理论“与其说理所应当出自多数人统治的善和正直的学说，不如说恰恰出自专制统治的卑鄙。说得更精确些，它依靠的是决定、或者对建议的采纳来避免或抵御专制。”^②这就是说，民主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相反，多数人的意见常常是非理性的。他们中间存在着崇拜“英雄”、“领袖”，不愿意决定自己命运的非理性倾向，而

赵敦华讲

波普尔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② 同上书，第234—235页。

这一倾向往往导致了民主制向独裁制的转化。例如，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在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上台的。波普尔把民主看作一种合乎理性，而不仅仅是符合大多数人意见的制度。因此，少数人有权不服从多数人的非理性的决定，反对独裁制度、维护民主制度是理性的召唤，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应承担的义务。

既然民主的原则是防止专制主义，民主制的优越性只是相对于独裁制而言，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制并不比开明的专制制度更有效。为了解波普尔的专政的思想我们不妨把政治体制分为三类：开明的专制，民主制和恶性的专制。开明的专制具有高效率的运行机制。由于不受其他势力的干扰，开明的专制统治者能够集思广益，迅速地制订出合理的方案，并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集中人力与财力，以最彻底的手段贯彻、实施方案。在民主制度中，方案必须通过各种意见的争论才能确立，方案在实施中也有赖于权力的平衡。争论和均衡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消耗掉一部分原来可以用来创造出更多功利效用的时间与精力。民主制似乎缺乏开明的专制所具有的统一意志和雷厉风行的效率，这大概就是相当多的人倾向于专制制度的缘故吧。虽然人们向往的是仁慈的独裁者和开明的专制，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得到的却是暴君统治。原因何在呢？原来，“权力”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东西。权力的滥用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是真正可以信赖的。在少数人独揽大权的专制制度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化”的现象更无法避免。因

此,一个独裁者可以开明一时,但却不会时时开明;即使他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后继者也是开明的。惟其如此,暴君统治才是专制制度的一般形式,而开明的或仁慈的专制只是它们暂时的、特殊的、过渡性的形式。政治家们一开始就应该正视暴君统治的可能性,而不应当从良好的愿望和幻想出发。民主制的出发点正是对滥用权力的警惕和提防,它以制度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滥用。真正的民主就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监督,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监督。选择民主制的依据不是两利相权取其大(因为开明专制或许可以比民主制带来更大的物质利益);而是两害相衡取其轻(因为民主制中的错误比专制者所犯的错误的危害性小,且易于纠正)。简而言之,民主制的优势不在趋利,而在避害。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框架,它不给予人们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争取的利益,它的可取性不在于它是最完美的制度,而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祸害。

3. 自由的悖论

自由如果意味着每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另一些人。“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这是一个悖论:“只要自由不受限制,它就会击溃自身。”^①“自由的悖论”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但却不能强求经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济上的平等。人在智力、体力上的自然差别是政治和法律无法控制和干预的。然而,这些差别在经济竞争中造成的后果却可以通过政治、法律的手段加以控制,波普尔极力主张的经济干预主义的目的就是要限制自由竞争带来的某些弊端,避免他所谓的“自由的悖论”。要言之,人是否自由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不在于他们是否生而平等。即使所有人都生而平等,极权统治者仍然要把他们置于枷锁之中;反过来说,即使人们生活在枷锁之中,开放社会的民主制度也会要求打开枷锁。因此,平等不能用牺牲自由的代价换取。为了控制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竞争尤其不能达到经济平等的目的。这是因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如果失去了自由,那么在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①

解决“自由的悖论”的科学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即,一方面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另一方面限制自由竞争产生的不平等。两者都是民主国家的功能。民主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性的:一方面保护个人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行动的损害。因此,波普尔把国家干预主义限制在保护性功能之内。他针对干预主义提出两项限制性条件。

第一,国家的干预应该局限于确保人民自由这一范围之内,不应该让国家拥有更多的、超出这种必要性之外的权力。过分扩大国家干预范围,最后有导致极权主义政府的危险。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第二,国家干预应该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不是直接的,出自“长官意志”的任意行为。波普尔把国家干预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反对扩大和滥用国家权力。他提出“最小政府原则”: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祸害,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他主张用“自由主义剃刀”(liberal razor),剃去国家政权中不必要的部分,把国家职能限制在对个人自由的保护。^①他特别反对国家被赋予道德教化的职能。国家控制道德生活,实际上是氏族禁忌的残余。他说,在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极权主义要求“道德政治化”,自由主义要求“政治道德化”。前者是封闭社会的残余,后者是开放社会的特征。

4. 宽容的悖论

宽容和自由一样,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度,它会毁坏自身。如果民主制宽容那些反对宽容原则的人,任其推翻民主制,建立独裁制,那么无限制的宽容是姑息养奸,其结果将是宽容原则之荡然无存。解决这一悖论的方法是限制宽容原则,使之不再适用于民主制的敌人。对不宽容者不宽容,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这不但在逻辑上合理,在道义上也是公正的。“因而我们应该主张,一切声明任何不容忍的运动都将自绝于法律,我们应该把煽动不宽容和迫害的行为视为犯罪,这跟我们应把煽动凶杀、绑架或恢复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奴隶贸易视为犯罪一样。”^①波普尔提出“宽容悖论”的动机是号召人们在法西斯主义危及民主政体存在的关头起而捍卫自身权利。在和平时期,应该把对宽容原则的限制降低到最低水平,更不应该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借口,剥夺政治反对派的发言权。因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高原则。开放社会之所以能够避免用流血和暴力方式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原因在于坚持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原则,通过对话、谅解、谈判和妥协的方式解决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矛盾,包括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思想上的分歧。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表现出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罢,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②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注。

②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

第四讲

赵敦华讲

波普尔
Popper

客观知识的世界

自五十年代之后，波普尔把研究重点转向形而上学。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与科学界的状况有关。由于现代物理学的特点，很多物理学家不再认为物理学的定律、公式是对自然界客观事实的描述和反映，而把它们看作是为了达到方便、简约或操作需要等目的，在科学家之间达成的协定。还有些科学家不加分析地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对哲学理论和概念持鄙视态度，对科学真理持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波普尔看到，物理学成了主观主义的堡垒。为了“捍卫客观性，反对主观主义”，他需要发展形而上学的实在论，用以说明科学理论，特别是物理学的内容的客观性。第二个原因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关。我们已经看到，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波普尔把认识论归结为方法论，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并且注意到

自己的科学方法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类似之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两者的类似是简单的比附，抑或理论上的巧合，抑或某种必然联系？五十年代之后，西方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潮，这促使波普尔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论证他主张的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把人类知识当作生物应付环境的一个特例，知识积累的方向与进化的方向相一致，科学方法论是进化论的应用和延伸。他的科学方法论与进化论的结合产生了一门名叫“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的学科。

实在论和进化认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波普尔对知识客观性的看法。在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客观知识被赋予本体论的意义。实在论、进化认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构成了波普尔晚期的形而上学的主体，这些也是本章所要介绍的内容。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

虽然波普尔一再声称，他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一些人还是把他的思想置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框架之中。确实，在很多方面，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然而，至少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波普尔清楚地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划清了界限。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基本纲领是“反对形而上学”，并且根据“证实原则”的标准，把形而上学的命题判决为不可证实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命题。他们反对和排斥形而上学的障碍，虽然他们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对人们宗教、

道德和审美生活的作用。波普尔虽然也关心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并且也把形而上学划入非科学领域,但是,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却比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温和。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命题的界限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者。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陈述经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混淆了“科学的界限”和“意义的界限”两个不同的问题。波普尔说,这一混淆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因为科学命题固然有意义,形而上学命题也未必无意义。他说:“和这些反对形而上学的策略相反,我的工作不是去推翻形而上学,而是表述概括经验科学的合适特征。”^①那么,形而上学具有哪些“表述概括经验科学的合适特征”呢?

首先,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针对某一问题而作出的猜测。只要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回答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命题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形而上学的猜测是非科学的,它却往往首先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以后的思想家对于这些问题作了更加具体和精确的经验考察,才创立了能够为经验事实所证伪,因而也是科学的学说。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的理论是科学理论的前驱。波普尔在《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地位》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形而上学的先驱作用:“一个哲学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也

^① K. R. 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1页。

是可列入他的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出前人未曾看出的一个谜、一个问题或一个悖论。这甚至是比解决这个谜更高的成就。第一个看到和理解一个新问题的哲学家打破了我们的懒散和自满,他之于我们就如休谟之于康德;他把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他在我们面前开拓了新的视野。”^①

波普尔曾用早期希腊哲学家们的猜测说明了形而上学的作用。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Thales)说:“世界由水构成。”他的学生亚纳西曼德(Anaximander)、亚纳西曼尼斯(Anaximenes)则说,世界由“无限”或由“气”构成。他们的猜测向传统的神话世界观提出了挑战:世界不是神创造的。它有着自然的“始基”和自身变化的原因。他们首先提出了“自然是由什么构成的?”“自然界运动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虽然他们的非科学的猜测早已为科学的理论所代替,但正是他们的问题,为物理学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近代的康德哲学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的作用。康德看到牛顿力学中心的一个悖论:他的理论是不可能由直接观察中总结出来的结论,然而它却普遍适用于所有观察到的现象。他提出的问题是:先验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虽然,他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先验论是形而上学的,但这一问题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观察与理论、经验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促进了现代科学哲学的诞生。

其次,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历史的。在人类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知识积累的过程中,许多原来不能被经验证伪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转化为能够被经验证伪的科学问题。例如,古代原子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进化论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地动说,原来都纯属形而上学的猜测,后来都转化为具有经验内容的科学理论。波普尔甚至进一步提出,神话也是科学的先驱之一。比如,“火星上是否有生命?”“月球上是否有山峰?”原来是在神话或幻想中的问题,但现在它们成了科学知识中的问题。为了说明形而上学向科学的转化,波普尔把形而上学比喻为浮悬在一个容器上部的尘埃,把科学比喻为容器底部的沉淀物,形而上学的尘埃不断向下沉淀,积累成为经验科学的内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波普尔肯定地说:“我们都是形而上学家,而且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历史根源。”^①

最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分不是纯粹的。一个科学理论可以包含着形而上学的因素。因为科学理论是大胆的猜测,形而上学的信仰对于科学家有时具有指导或启发作用。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例。哥白尼受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太阳”这一概念和形象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是至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神圣之源,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观念世界的“影子”,受惠于从太阳中流溢出来的理性之光。根据这种形而上学信仰,太阳不可能围绕着地球转。哥白尼因此大胆地猜

^①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1067.

测：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假说通过了经验的严格检验，而被确认为科学的理论。开普勒定律的发现也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开普勒的老师弟谷·布拉赫(Tycho Brahe)已经积累了足以反驳“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观察资料，但他却囿于传统的“圆形运动是最完美的运动”的观念，未能提出新的理论。开普勒却从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中获得灵感，他相信有一种力像光线一样从太阳中流出，操纵行星运动。根据力学计算，行星运行轨道应该是椭圆形而不是圆形。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形而上学和科学彼此交替、互相影响的情形层出不穷。

并非所有形而上学的理论都对科学研究具有指导、启发和促进作用，在“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地位”一文中，波普尔批判了五种形而上学理论：决定论、唯心主义、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说它们不仅不符合科学知识，而且也不符合人类健全的理性：它们虽然不能被经验事实所证伪，在理性的批判面前却难以自圆其说。

波普尔推崇的形而上学是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纲领的形而上学。作为研究纲领的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前提，它们虽然不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然而却能够接受理性的批判，以适应科学知识的状况。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把人们对经验事实的认识综合起来，对客观世界提出了一个满意的解释。总之，与现有的科学知识相适应，对今后的科学研究具有启发作用，能够在理性批判中改变自身，这些就是形而上学纲领的主要特点。

具体地说，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的形而上学有两个：其一是实在论，其二是进化论。下面，我们分别对波普

尔的两个形而上学的纲领作进一步的说明。

第二节 实在论的研究纲领

1. 为什么要相信实在论？

所谓实在论,指的是一种承认外部世界客观实在的哲学立场。波普尔说,实在论不但与科学知识,而且与一般人的常识相符合。“常识的实在论认为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其中有实在的人,动物、植物、车辆和星辰,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对它的批判都是不正确的。”^①实在论是对“世界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回答。经验事实无法证伪它,因而实在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为实在论寻求科学证明是徒费心机,认真地探讨“物质”概念的哲学内涵也没有必要。波普尔相信实在论,仅仅出自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实在论的对立面——唯心论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是荒谬的。“唯心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它意味着我的精神创造这美好世界。但是,我认为我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当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然界正在遭到毁灭性的灾难的时候,哲学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这个世界是否存在,这真是最大的哲学丑闻。”^②

第二,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仰是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的动力。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是科学内容的实

^①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1016.

^② Ibid., pp. 966—967.

在性,否认实在论必将阻碍科学研究的深入。波普尔举出了几个历史上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神学家奥西安特在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序言中写道:哥白尼的假说“不必是真的,甚至根本无需像是真的。它们只需要一点就足够了,它们能使计算同观察一致”。宣判布鲁诺死罪的审判官贝拉米诺大主教也说:“假如伽利略假设性地推测:‘假设地球运动而太阳不动,能对现象提供一种更好的说明’,那么这种说法是恰当的,伽利略的行为也是谨慎的,没有什么危险,他的理论不过是数学家的需要而已。”他们的话从反面证明,如果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屈服于神学教条,不坚持他们的理论是对实在的描述,他们将不可能发现科学的理论。贝克莱主教说,牛顿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数学假设”,是对现象进行计算和预言的方便工具,不是对实在事物的真实描述。

近代物理学以实在论为前提,摆脱了神学家的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的影响,因而才能有长足的进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的许多物理学家放弃了实在论,他们或者把科学研究对象当作主观的感觉材料,或者把科学理论说成是主观约定的工具。波普尔辛辣地说:“奥西安特、贝拉米诺大主教和贝克莱主教所奠基的这种物理科学的观点,没有再放一枪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这个哲学问题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论争,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工具主义观点就已经成为公认的教条,……所以现在完全可以把它称为物理学

理论的‘官方观点’。”^①波普尔指责,否认外部世界存在的主观主义要对物理学发展停滞的局面负责。只有坚持把实在论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物理学的深入发展才有可能。

2. 现代物理学的主观主义

为了反对泛滥于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波普尔联系现代物理学的重大课题来发挥他的实在论观点。现代物理学中的主观主义有两个有力的证据,一是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关系,二是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关系表明,人们不能同时精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质量和速度。互补原理表明,量子粒子性(它的时空坐标)和波动性(它的动量)只能在互相排斥的实验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海森堡和玻尔都强调基本粒子的性质和人们使用的测量仪器等观察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由此得出结论:在微观世界里,客体和主体不可区分,用以描述客体连续性的因果规律的概念不再适用于量子力学。他们用“几率波”的概念代替“因果关系”的概念,用统计规律代替客观规律。

波普尔还用实在论的观点看待物理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熵。他说,主观主义早在量子力学建立以前就已经侵入物理学领域。他指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现之后一些物理学家对熵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当时流行的“热寂说”即是以这一唯心主义解释为基础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的宇宙论和本体论。19世纪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波耳茨曼虽然在很多问题上主张客观主义和实在论,但他却接受了关于熵的唯心主义解释,提出了一个主观主义的“时间之矢”的理论。这个理论被后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薛定谔、莱辛巴赫等人所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理论的大意是:时间在客观上如同空间坐标一样没有方向,因此存在着在时间上完全对称的两个客观宇宙,在其中没有过去和将来之分的宇宙。然而,在宇宙中存在着熵的涨落。生命是在罕见的低熵状态剧增的情况下,即在能量剧烈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高等生物所能经验到的只是熵的增加的方向,而不是熵的降低方向。在后一种情况下,宇宙趋于热平衡,这意味着生命的消失。在前一种情况下,高等生物感觉到了变化的单向性,这就是时间一去不复返的一维性,即,从过去经由现在流向将来的“时间之矢”。

波普尔把这种理论判为主观主义,因为它把时间的客观特性说成是一种意识状态,是动物对于熵的增加的经验。波普尔批评波耳茨曼说:“他的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至少对一个实在论者来说。它视单向的变化为幻觉。这种思想使广岛的灾难成为一种幻觉。因此它使我们的世界成为幻觉,也使我们发现更多的有关我们世界的东西的一切努力随之而成为幻觉。”^①波普尔对于时间之矢的看法涉及到生命的进化、知识的积累、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变化。对于他来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说,把时间之矢说成为仅存于动物经验之内的主观主义意味着把一切实在和变化均视为幻觉,因此才受到他如此激烈的批驳。

3. 概率规律的客观性

在哥本哈根学派把量子力学的统计学解释成数学工具和主观约定的情况下,爱因斯坦认为,微观世界中存在着人们可以认识,但却未被认识的客观规律,适用于量子领域的统计学规律只是由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缺乏认识而采取的补救方法和权宜之计。这两种立场的对立,造成了现代物理学中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之间的争论。

波普尔在这场争论中并未置身度外,但他也没有在争论的双方观点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他把争论的焦点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微观世界有没有客观规律?第二,关于世界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谁是谁非?在第一个问题上,他间接地支持了爱因斯坦的立场,在第二个问题上,他则倾向于同意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

波普尔之所以同争论双方都保持了一定距离,是因为他发现了两者共同的缺点。无论是哥本哈根学派还是爱因斯坦都没有承认统计规律的客观性。他们都认为,统计规律是出自某种主观需要而采用的人为方法。他们关于规律的认识仍然局限于经典的概念:自然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既然统计学中的概率描写的不是特定的原因产生特定的结果,而是大量现象的大致趋向,它当然不能反映经典物理学中所理解的自然规律。但是,波普尔认为,关于规律的经典概念过于狭窄,致使趋向性被排除在规律性之外。

为了说明概率的客观规律性,他提出了关于概率的趋向性理论(propensity of probability),该理论的要点是:我们无法预测一个体系的运动结果,因而可以说这一结果是任意的。但是,如果重复实验表明了该系统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稳定性,那么,这一稳定性反映了该系统的内在的趋向性。内在的趋向性表明的不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是系统和它所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波普尔说,趋向性是实在论者“对原因的概念,特别是对力的概念的非决定论的概括”。^①当趋向性达到最大值,即达到概率的最大值1时,趋向性就是经典物理学中所说的力。力是该系统对周围系统的作用,是它们运动的原因。该系统和环境之间更为复杂的互相作用则产生了这一系统的趋向性,用概率表示,其数值在1—0之间。趋向性从一个系统和它的环境(包括众多的系统)之间的排列、结构和关系中产生,而不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能干预、控制和约定的结果。因此,概率所表达的是一个系统所固有的客观趋向性。

趋向性的客观性也就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经典物理学的规律可以用力学解释。既然力只是趋向性的一个特例,那么,经典物理学中的规律性和量子力学中的趋向性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也不在于前者是因果关系,后者不是因果关系。确切的答案应该是:经典物理学中的规律是可被准确预测的,符合决定论的,而量子力学规律不能被准确预

^①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1130.

测,不符合决定论的要求。

4. 非决定论的客观规律

规律性和决定论对波普尔来说并不是同一回事。说世界有客观规律,并不等于说世界中所有事物都被客观规律所决定。他曾用“钟和云”的比喻说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分歧。“云”代表了这样的物理系统:不规则、无秩序、难以预测;“钟”代表了有规则、有秩序和高度可预测的物理系统。物理学中的决定论者犹如在说:“所有的云都是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非决定论者则坚持钟和云的区别,否认云能被归结成钟。他们否认所有事物在一切细节上都以绝对精确的方式被预先决定了。但是,非决定论者并不否定规律性。云的非决定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没有原因的。因此,在物理学中坚持非决定论并不妨碍对客观规律的追求和对外部原因的探索。相反,在经典物理学中符合决定论的规律不适用的领域,仍然固执地坚持决定论,倒是容易走向它的反面,滑到否认客观规律存在的主观主义立场。^①

不难看出,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和前面介绍的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非决定论是相一致的。“一个物理系统是否预先被决定”的确切含义是,“我们能否精确地预测这一物理系统的未来状态”。波普尔争辩说,即使退一步说,承认经典物理学的规律普遍有效,我们仍然不能得到决定论的结论,说我们能够精确

赵敦华讲

波普尔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221页。

地预测物理世界未来状态。即使人们可以完全了解全部物理系统之间在现时的所有相互作用,他们自身(人的物质构造也是物理系统)将来和各物理系统的相互作用也不能被精确预测。人对其未来知识状态的不确定性和物理世界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一码事。

第三节 进化论的研究纲领

1.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否是科学理论?

进化论是波普尔的另一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现在,很多科学家都会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生物学理论。波普尔却否认进化论的科学性,他说:“达尔文主义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一个供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用的可能的框架。”^①

为什么说进化论不能被检验呢?波普尔说,那是因为它关于生命起源的解释,关于进化规律的说明是不可证伪的。达尔文主义的原则是“适者生存”,但“适者”是已经生存的物种,因此“适者生存”的意义不过是“生存者生存”,这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并不能、也不需要被经验证据所检验。波普尔的这些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基督教的创世论纷纷用波普尔的“同义反复”说批判进化论。

但是,波普尔最后改变了他的立场。在1977年在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所做的题为“自然选择及其科学地位”的讲演中,他说:“我改变了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可检验性和逻辑地位的观点,我愿意借此机会撤消过去的观点,并希望我的观点的撤消,对自然选择的理解,能有一些贡献。”^①

波普尔所撤消的只是关于进化论是“同义反复”的说法,他并没有改变过去把进化论的逻辑定位在“境况逻辑”的看法。所谓境况逻辑是指科学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研究的一个逻辑框架,它规定:“设有一个世界,一个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变异性有限的实体。于是因变异而产生的某些实体(‘适应’框架条件的那些实体)可以‘生存’下来,而其他实体(与条件发生冲突的那些实体)则被淘汰掉。”^②波普尔所说的境况逻辑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事物存在的决定性条件理解为变异、排错,而不是遗传、保守。物种的进化是如此,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人的精神的成长也无不如此。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论和哲学都具有指导作用。波普尔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为境况逻辑的具体化,目的是把进化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转变为科学研究的纲领。

2. 进化认识论

波普尔提出的进化认识论被他的追随者誉为“17

^① Popper *Selections*, ed. by D. Mil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42—243.

^②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世纪以来认识论的最大成果”。在第二章里,我们已经介绍了波普尔对传统的认识论所持的批判立场。早期的波普尔把传统认识论的问题“认识的基础和源泉是什么?”归结为科学哲学的问题:“科学知识是如何积累的?”他用科学方法论代替传统的认识论,表现出消解认识论的倾向。但随着思想的深化,波普尔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有理论背景和哲学依据。经典物理学以及与之同步发展起来的近代认识论是归纳法的理论背景和哲学依据。他所提倡的试错法固然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配合,但却不大可能从现代物理学那里寻得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是因为试错法的思维方式是境况逻辑;而物理学必须依靠必要的数学手段,它的推理方式与数理逻辑(包括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分不开。

波普尔认为,传统认识论以物理学为模式来提出和思考问题,他在科学方法论中提倡的变革实际上把认识论的物理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学模式。强调自然选择的达尔文主义与强调适应环境的拉马克主义的对立,类似于强调证伪的试错法与强调证实的归纳法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达尔文主义对于波普尔来说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纲领。在这一纲领的理论框架中,他建立了进化认识论,使他的科学方法获得了认识论依据。进化认识论包括两个向度:一是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人类认识;二是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生物进化。以下分别谈进化认识论的这两个方面。

3.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人类认识

进化认识论有两个主题:知识和感觉。这也是传

统认识论的主题。两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何在呢？大致说来，传统认识论以物理学为模式，强调主观和客观的区分。在这种模式下，知识被视为人所特有的理性思维的结果，感觉是外界事物经过感官的改造之后留在人脑中的印记。进化认识论以生物学为模式，强调主客观的同步变化与一致性：知识的本质是生物的变异活动，感觉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相一致的基础上出现的事物表象。

波普尔认为，知识的根本作用是解决问题，并且知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生存，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任何生物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本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生物都拥有必要的知识。这种广义上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前身。广义的知识定义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尝试性的探索活动。波普尔说：“探索者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这意味着他有某些知识，即使是模糊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先前通过实质上相同的试错方法而获得的。这一知识起着导向作用，它排除了完全的任意性。”^①他还说：“动物甚至植物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并且它们也用竞争的尝试性解决和消除错误的方法来解决它们的问题。”^②

波普尔把试错法的应用范围从科学方法扩大为一切生物适应环境的本能。同理，人类知识积累的四段图式也被扩大为适用于生物进化过程的图式。生物的

^①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1061.

^②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进化也经历了对问题(P_1)的尝试性的解决(TS),在排除其中的错误(EE)的过程中,应付新的问题(P_1)等阶段。具体的说,每一生物种类都通过遗传,先天地获得了适应环境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看作是对关系到它们生存的问题(P_1)的某种尝试性解决(TS)。然而,环境发生变化之后,该物种面临新的问题,会产生变异,或者改变行为方式,或者改变机体结构。如果变异成功地解决了新的问题,物种得以保存,并通过遗传保留变异的结果。反之,如果变异是不成功的反应方式,它将连同物种被自然所淘汰。根据这种解释,在生物进化的四段图式中,尝试性的解决(TS)是变异和遗传,排错(EE)是自然选择,问题(P_1 和 P_2)则标志着物种要适应的环境变化。

波普尔认为,进化认识论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解决了传统认识论在感觉问题上的一个难题。传统的观点认为,感觉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摹仿。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感觉中的印象如何必定与独立于感觉之外的客体相符合?哲学史上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彻底的经验论。它断然否定事物可以独立地存在于感觉经验之外,把事物还原为感觉印象之复合性。感觉内容与感觉对象的同一性确保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另一种方法是先验论。它也排除了事物自身被认识的可能性。感觉印象在先验的形式和结构之中被综合成现象。主体不可能脱离先验形式和结构的统摄作用去感知外部事物,这就保证了感觉经验和外部现象的一致性。波普尔同意,感觉受某种先验的因素统摄。在这一点上,他接受了康德的先验论。但是,另一方面,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康德所说的先天知识必定

正确的观点,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先天知识有不同的理解。波普尔所说的先天知识是生物学中研究的生物应付环境的方式,而康德所说的先天知识主要指的是经典物理学的逻辑前提。随着科学的发展,康德所谓的先天知识已被证伪。波普尔肯定先天知识不可能是必然真理,它们不断被证伪是生物进化中的事实。即使在生物进化的最高阶段出现的理性也不能发现不可证伪的先天知识;相反,理性的健全功能就是对先天知识所持的自觉的批判态度。

波普尔肯定先天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解释理论和经验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波普尔批判归纳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任何观察都受带有理论色彩的假说与期望的指导或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局限在物理学的“主、客观对立”的模式之内,理论被看作是对经验观察材料的解释,那么没有经验观察也就不会有理论。在此意义上,观察又先于理论。这样,“假说(hypothesis)和观察(observation)哪个在先?”的问题,就像“鸡(hen)和鸡蛋(O)哪个在先?”的问题一样,对这两个“H—O”问题的解答都会陷入无限循环的悖论。为了打破无限循环,我们需要第三个因素,它既能解释以观察为根据的理论,又能解释以理论为指导的观察。这个因素即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天生的反应。这是生物所具有的期待“相似性”或“规律性”的天生倾向。没有这种天生的倾向,也就没有动、植物乃至更为低级的生物的节律性和同期性的活动。波普尔说:“鉴于期望与知识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在相当合理的意义

上谈论‘天生的知识’。”^①由此可见,广义上的先天知识就是支配生物反应的、寻求外部环境类似性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企图。这种企图在采取反应之前就已经预先设定:环境中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似性、重复性。它也是一种假说。如果我们把假说理解为支配观察的先天倾向的话,对于“假说与观察哪个在先?”的回答只能是假说在先。

4. 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生物进化

波普尔的进化图式并不完全符合达尔文主义。他于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现代达尔文主义)分为保守的和进步的两部分。保守的部分强调遗传的自我复制作用和基因对变异的控制作用。进步的部分强调可遗传的变异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以及自然选择对变异结果的严格检验。波普尔认为进化论中的保守部分相当于教条思想,进步部分相当于批判思想。他把进化的动力归结为变异的尝试和自然选择的排错,把进化的方向看作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直向的系列,把进化的方式解释为突现而不是渐进,使得进化论完全符合批判理性主义的要求。

波普尔说:“认识论的主要任务是理解人类知识与动物知识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②他的进化认识论是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设计的。他把知识分为“动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②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1061.

物知识、前科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①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总是相同的：我们试图解决我们的问题，并且通过排错过程，在尝试性的解决中接近适应性。“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②

既然动物知识被理解为生物反应的进化倾向，那么知识的性质应该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波普尔把生物的基因分为两类：构造解剖学特征的 a 基因和控制行为的 b 基因。b 基因又包括两个分类：控制有机体爱好与目的的 P 基因和控制有机体技能的 S 基因。生物本能性的行为程序以遗传密码方式编制在 b 类基因的 DNA 链条上。根据生物学家迈尔（E. Mayer）的区分，编制在 b 类基因上的行为程序可分封闭的和开放的两种。封闭的程序严格地规定了动物的全部细节；开放的程序对动物行为的控制不像那样严格，使得动物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毫无疑问，开放的程序有利于进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被封闭的程序严格控制的有机体因不能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很快死亡。被开放程序控制的有机体有可能作出适应环境的反应。首先，它们在 P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3 页。

^② 同上书，第 357 页。

基因允许的范围里,改变了某些爱好和目的。这种改变最初表现为试探性的行为,试探一旦获得成功,生物追求新的爱好和目的的行为很快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这一环境有利于控制爱好和目的的 P 类基因的变异,有利于控制技能的 S 基因中有利于新的爱好和目的的变异的保存和遗传;最后,控制解剖学特征的 a 类基因中有利于新技能的变异也在遗传中被固定下来。由此可见,基因变化的过程是 $P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a$ 。波普尔以啄木鸟为例,环境变化首先引起啄木鸟基因中与食物爱好相关的变异成功,这一变化接着使得控制技能的基因 S 有利于啄木技能的变异获得成功,最后,造成了啄木鸟的喙和舌变异的成功。啄木鸟因此适应了变化的环境而生存下来。

在基因变异引起的进化过程中,爱好和目的的改变触发了整个进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初,有机体的爱好和目的的改变只是适应环境的一种保护性的本能反应。例如,树上的叶和果实的枯萎迫使原来以叶、果为生的鸟类不得不食昆虫。但是,一旦这些爱好和目的的改变被编进基因的固定程序,这些爱好和目的便成了某种先天性的期望。有机体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目的,对环境中的事物进行辨认、分类和组合,并且在这种“先天知识”的基础上,采取合适的反应。这一进化过程解释了人的感觉器官的诞生。感觉最初起源于对某些分辨与类似的特殊爱好。当这种特殊爱好引起基因的变异之后,接着发生了某些器官功能的变异,最后是感觉器官的出现。感觉是根据编制在基因中的程序,通过感官的功能完成的适应环境的反应行为。波普尔的结论是,人类的感觉实际是根据先天的期望对

外部环境的解释。他说：“根据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视觉如同雷达一样，是间接的。”这里所说的“间接”的意义是：“感觉不给予我们任何东西。一切事情都被解释、被译成信码，一切事情都是在探索的驱动力的控制下积极实验的结果。”^①这就是说，感觉并不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而是根据先天的程序对事物作出的解释。由于这种先天的程序在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中产生和固定，我们只能以这种特殊的感受方式去看待和解释环境。采取其他方式意味着和环境不相适应，必然被自然所淘汰。感觉和环境不相一致意味着感觉主体的灭亡。因此，进化过程已经以变异和选择的后果回答了“感觉和感觉对象是否相一致”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类必须接受的解答。我们可以尽力理解这一解答，但却不能拒绝这一解答。

波普尔认为，达尔文强调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成功的变异是成功地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变异。波普尔强调的是爱好的选择，成功的变异是由创造出新的生态环境的爱好触发的。他说，如果说广义上的知识起源于生物面临的问题，那么“大多数问题与其说是因生存而提出，不如说是因爱好，尤其是本能的爱好的提出；并且即使所说的本能在外部的选择的压力下会进化，它们提出的问题一般也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②比如，鸟寻找较好的筑巢地是一个涉及到鸟的爱好问题，

^①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1062.

^②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并不是关系到鸟类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爱好又与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自然选择相联系,爱好问题和生存问题很难区分。波普尔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区分,大概是因为他嫌物竞天择之说的决定论色彩太浓,想在进化论中给自由选择和非决定论争下一块地盘吧。

5.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

虽说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之差,但这一步之差却造成了人类知识与生物知识的巨大鸿沟,它使人成了万物之灵,而阿米巴却是亿万年没有任何进化。“爱因斯坦与阿米巴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追求消除错误。他试图推翻自己的理论;他自觉地批判自己的理论,为此,他力求清晰地而不是含糊地表述他的理论。而阿米巴却不能面对面地批判它的期望或假说。它之所以不能批判,因为它不能面对着它的假说,假说是它的一部分。”^①

人类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意识和语言,二是具有批判精神。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假说,用语言表达知识。他们使用的是“符号试错法”。由于符号是人和世界的中介,在符号试错法中被环境所淘汰的是错误的命题,而不是人自身的存在。因此,人能够自觉地运用批判理性,主动地、积极地发现错误,反驳假说。没有意识和语言的生物则不同。生物只能通过变异和遗传获得所需要的知识,排错的过程是自然选择,错误的代价是物种灭亡。因此,生物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不可能主动地寻求排错,只能等待自然选择的“最后的审判”。但是,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在生物界,试错的结果总是一个直进的系列:人类的进步表现为理性代替愚昧,开放代替封闭,繁荣代替贫困。生物的进化的方向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意识到有意识和理性。

当然,人类知识与生物知识之间的不连续性不是绝对的。在封闭的社会里,人所特有的理性的批判功能被压制甚至被窒息,人们虽然具有意识和语言,却不能自觉地、主动地运用体现人类优越性的“符号试错法”。他们被降低到无理性的生物一样的地位,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自我毁灭的代价。如波普尔所说:“在前科学的阶段,我们时常连同错误的理论一起毁灭自身,排除自身。在科学的阶段,我们系统地尽力排除我们错误的理论,尽量让我们的错误理论代替我们自身而灭亡。”^①这段话解释了波普尔为什么提倡理性批判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终极原因。

第四节 三个世界的理论

1. 三个世界的区分和关系

在实在论和进化认识论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三个世界构成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系统。形而上学是对存在的方式(modes of being)以及存在事物聚合(togetherness)的研究。波普尔从词义学

^① B. Magee (ed.), *Modern British Philosophy*, London, 1971, p. 73.

上考察,把“存在”(to be)一词的涵义分为三种:外部事物的存在,思想意识的存在和关系的存在。形而上学根据这三种存在方式,把存在分成三个领域,即三个世界。

世界1是物理世界。如物质、能量、一切生物的机体,包括动物的躯体和头脑,等等。

世界2是人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感觉等心理状态和过程。这是哲学中所说的主观世界。

世界3是思想的内容。思想的内容可以被物质化,成为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如语言、艺术品、图书、机械设备、工具、房屋建筑,等等。思想内容也可以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的意识的固定对象,如问题、猜测、理论、反驳、证据,等等。总而言之,世界3是客观知识的世界。

三个世界是统一、连贯的。它们的统一性表现为:第一,宇宙的发展按照由世界1经过世界2再到世界3的连贯直向方向进行,三个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世界1和世界2、世界2和世界3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世界1和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以世界2为中介。

波普尔对世界1的发展过程的描述以自然科学为依据,这是一个由无机物到有机物,再从无生命的有机物到生命的发展过程。波普尔认为,由世界1到世界2的过渡的关键是意识现象的发生,这个问题比生命起源的问题更难解决,关于意识起源的假设也许永远不能成为可检验的科学理论。为此,他只能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形而上学的假设。在进化过程中,有些动物在它的神经中枢出现某些警告信号,如不安、不舒适或

疼痛。警告信号使得动物改变行为方式,避免更大损害。随后,在神经系统中出现了代表警告信号的想象符号,使得动物能够采用“想象的试错法”,代替以身试错的实际试错法。这样,它们能够在不受痛苦或损伤的情况下就可以排除错误。想象的试错之后出现的是动物对试错后果的反应,对有利的后果的反应是期待,对有害的后果的反应是逃避。期待和逃避都是合目的性行为。目的和意图便是意识的萌芽,但只是进化发展到了人类阶段,才出现了意识现象,伴随着意识出现了语言以及其他文化现象:艺术、宗教、道德和科学技术。世界2和世界3是人类特有的世界。

2. 世界3

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是关于世界3的理论。在波普尔之前,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有客观和主观之分。但是,波普尔却提出,独立于这两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世界3。关于世界3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波普尔关于世界3的理论说明了世界3与其他两个世界,尤其是世界2的区别和联系,其要点如下。

(1) 世界3不同于世界2

世界2指的是心理和思想的状态和过程,它是主观的;而世界3则是思想的内容,它是客观的。没有客观的意识、精神,但却有客观的知识。这是因为客观知识与人的主观意向无关,它的存在不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以世界3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书为例,即使没有读者,一本书仍然是一本书,正如没有鸟栖息

的鸟巢仍然是鸟巢。波普尔说：“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灭亡以后，某些书籍或图书馆可能会被某些我们的文明后继者发现，不论这些后继者是文明化的地球动物还是某些天外来客。这些书籍可能被译解。”^①把世界3同世界2区别开来的原因在于，心理和思想过程是流动的、不定形的、隐蔽的，而任何知识都有相对稳定的、固定的和公众可以接近的内容。“决定性的是我们能够把客观思想——即理论——放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能够批判它们和就它们进行讨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多少持久的（尤其是语言的）形式表述它们。”^②这就是说，只有把客观知识的世界和属于个人的主观世界区别之后，才会有知识自身的积累和发展，知识才能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不至于仅仅存在于发明家的头脑里。

（2）世界3也不同于世界1

固然，世界3的很多要素被物化在世界1之中，如语言被物化在声波和书写符号之中，理论和文学被物化在纸张笔墨之中，艺术品被物化在特定材料（如绘画材料、雕塑材料等）之中，技术被物化在机器设备之中。这些人工产品和文化产品是人利用世界1的材料制造而成的。人的知识是这些物质材料的价值和灵魂，没有前者，后者只是一堆无益于人的废料。人们如果要理解这些体现了人的知识和思想的物质产品的特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②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殊价值,就必须把它们同自然界中自生自灭的物质区别开来,把它们归属于一个与物理世界不同的特殊世界。再者,世界3是物质材料的思想内容。不管人们是否认识了,或者物化了这些思想内容,它们都自主地存在着。因此,世界3的要素有些已经被物化,有些则未被物化而处于潜在状态。后者是那些尚未被认识的知识的客观内容,如最大的质数的值,哥德巴赫猜想的解答,有待发现的人工化合物和科学仪器,等等。波普尔说:“不仅已经发表在报纸、书刊上的物理理论以及根据它们作出的物质器械是实在的,未被具体化的世界3的成员也是实在的。”^①如果具体化的世界3的成员是“世界3·1”(其意义是,它们既属于世界3,又属于世界1),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公式:“世界3 > 世界3·1。”其意义是,世界3的全部成员多于具体化的世界3成员。

(3) 世界3的自主性

波普尔声称,自主性的观念是世界3理论的中心。自主性观念有多重意义。首先,世界3成员具有本体的地位,就是说,它们是客观实在,如同桌子和椅子一样实在。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主性。

其次,世界3以自身固有的方式产生出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具有相对于人的意识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绝对的。很多世界3的成员是按照人的思想意识进行创造的结果,但

^① K. R. Popper & J. Eccles, *The Self and Its Brai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Berlin, 1977, p. 47.

是,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就有了不依赖于人的思想的独立性。“大家承认理论是人类思想的产物,然而理论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它们在客观上可以有迄今为止没有想到的推论。人们可以说,世界3只是在起源上是人造的,但它一旦存在,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①比如,数字序列是人创造的。但是,奇数和偶数却不是人创造的,它们只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一个后果。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它们也自主地存在于数列之中。

再次,自主性还意味着不可还原性。世界3的自主性是相对于其他两个世界而言。每个世界都有自己固有的、其他世界所没有的特性和特殊规律;并且这些特性和特殊规律在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不能从其他世界的特征和规律中推测出来。自主性观念反对把知识还原为思想,把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现象。

为了坚持三个世界之间的不可替代和不可还原关系,波普尔把因果关系分为上向关系和下向关系两种。下向的因果关系是宇宙的高层次结构对低层次结构的因果作用,上向的因果关系则反之。还原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上向的因果关系,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只有机械因果法则和物理规律在起支配作用的封闭系统,犯了机械决定论的错误。承认因果关系的双向性是和波普尔一贯坚持的非决定论立场相吻合的。

(4) 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尤以世界3对世

^① K. R. Popper & J. Eccles, *The Self and Its Brai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Berlin, 1977, p. 40.

界2的作用为重要。其余的相互作用是明显的、公认的。例如,世界1和世界2的相互作用表现于生理和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世界2对世界3的作用表现于思想意识对语言、理论和艺术创作的作用,世界3通过世界2的中介与世界1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于人类知识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却阻止了人们对于世界3对世界2作用的认识。根据这一观点,知识是人的内心精神活动创造的,知识不可能脱离人的意识自主地发展。波普尔把这种看法归咎于传统的认识论,他说:“洛克、贝克莱、休谟甚至罗素的传统认识论从相当严格的词义上来说都是离题的。这个论点的推论是,大部分现代认识论也都是离题的。”这是因为“传统的认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世界即主观意义的知识上,离开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①。根据他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明是从问题开始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问题不是人们有意识制造的,它们从猜测以及对猜测的批判过程中涌现出来,问题是人们创造活动的始料未及的后果。问题使得人们的主观意识集中于一个焦点,激发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问题在科学发明中的作用充分显示了世界3对世界2的作用。波普尔强调,这一作用甚至比世界1对世界2的作用更大。他说:“我们的心灵和自我没有世界3便不能生存,它们牢牢地固定在世界3之中。应该把我们的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习惯都归结于

^①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19页。

理性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应该把我们的智力发展归结于这种相互作用。简而言之,人的理性、意识和自我只是在世界2和世界3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发展、成熟起来,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问题。”^①

(5) 解决身心问题的一个方案

借助世界3的理论,波普尔重新理解和解决笛卡儿提出的身心关系问题。笛卡儿问题的经典形式是:人是否同时存在于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之中?两者有无关系?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波普尔把身心关系问题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自我与身体的关系问题。不难看出,第一个问题可以用世界1和世界2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第二个问题之解决,则要考虑世界3对世界2的作用,以及世界3通过世界2对世界1的作用。此外,世界2对世界3的作用也导致了世界2与世界1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作用都包括在自我与身体的关系之中。波普尔用三个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解决身心关系问题的努力反映在他和艾克斯斯合著的《自我及其脑》这本书中。

波普尔和艾克斯斯在《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人的一种二元论的学说。与传统的二元论不同,它是区别人的意识和心灵的二元论,是对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科学证明。艾克斯斯通过脑

^①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明人确有与意识和身体不同的心灵(mind)或自我(self)。心灵处于大脑的联络脑。联络脑区域非常巨大,包括优势半脑的大部分,特别是语言区,由不同的、大片连续的大脑皮层组成,拥有10万或数目更多的升级图式。但联络脑的神经结构只是“自我”的物质形式,正如纸张构成的书是思想的物质形式,但思想不等于纸张的结构。“自我”是连续脑的功能,它既不是物理、化学、神经生理的,也不是信息处理。“自我”的功能没有特定的物质结构,既不输入、也不输出物质能量,它处在大脑的最高水平,是独立于身体、意识的存在。人是三个世界的缩影。其中人的身体和脑属于世界1,心灵和语言属于世界3,二者通过人的意识(即世界2)相互作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整体,因此,心和脑以及身和心是一个统一体。

赵敦华讲

波普尔

第五讲

赵敦华讲

波普尔
Popper

理性批判主义的理性批判

以理性批判主义为旗帜的波普尔哲学把批判作为理性的根本功能。判断一个学说或理论是否符合理性,也要以其批判功能为标准。批判的标准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看这个学说或理论是否具有批判其他理论的内容;第二重含义是看它是否能够接受其他理论的批判。只能批判而不能接受批判的态度不是理性的态度,我们不能以这种态度对待波普尔哲学,不能全盘接受它而忽视对它的批判;否则,我们便违背了波普尔哲学的初衷。为了理解理性批判主义的真谛,我们不但需要了解波普尔在批判中建立起来的理论,而且需要了解他的理论是如何被后继的理论所批判和替代的。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根据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向来批判和评价他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波普尔哲学的影响

波普尔不是“纯”哲学家,他的思想不是象牙塔里的思辨,因而对知识界有着广泛社会影响。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是科学和民主。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弘扬了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而他的政治哲学以保卫民主制度、批判极权主义为己任,这两方面都顺应了西方社会的需要,鼓舞了人们的精神。以下,分别介绍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社会影响。

赵敦华讲

波普尔

1. 鼓励创新的科学哲学

波普尔科学哲学以其别致的思路、清新的风格和机智的论辩赢得了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青睐。美国哲学家普特南(H. Putnam)说:“卡尔·波普尔爵士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的著作实际上影响和激励着在科学哲学领域内每一个从事研究的人。”^①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则说:“波普尔的思想代表了二十世纪哲学最重要的发展。”^②

波普尔在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领域中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想,比如,他提出了概率的趋向性解释,关于物理规律非决定论的观点,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以及评价科学理论的逻辑手段。这些思想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赞赏。诺贝尔医学奖金获得

^① K. R. Popper, “Replies to My Critics”,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I,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4, p. 221.

^② Ibid., p. 241.

者、英国生物学家梅多沃爵士(P. Medawar)于1972年7月28日的BBC广播中说:“我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另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澳大利亚生理学家艾克斯爵士在《面对现实》一书中说:“可以这样说,我的科学成就归功于1945年我对波普尔关于科学探索行为的教导的皈依。在这种行为的程式上及在对神经生理学基本问题的探索中,我一直努力地跟随波普尔。”他建议,科学家应该“阅读和思考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以此打下他们科学生涯的基础”。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迪爵士(H. Bondi)直截了当地宣称:“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莫诺(J. Monod)在《论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书中,指出偶然性是生物学的中心概念。分子的偶然突变是进化和创造的源泉,进化论的根基是非决定论。他还提出了“批判的认识论”,主张客观知识是真理的唯一可靠形式。这些思想与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说:“在这些方面,我发现自己与波普尔完全一致,并为此而感到自豪。”^①

波普尔60寿辰之际,29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Bridgman)等人撰文庆祝。加拿大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邦格在文集的序言中说:波普尔“已被公认为当代最

^① 转引自 B. Magee, *Popper*, London: Fontana Collins, 1974, pp. 9—10。

深刻、最严谨、最富有才华和独创精神的思想家”^①。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不过，他的另一句话却是无可置疑的：“波普尔的追随者和他在学术上的对手都对他怀有极大的尊敬。”不错，不管人们是否赞成他的哲学，但却不能忽视他在科学界中的影响。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魅力在于它展示、并且充分肯定了科学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来自科学家的灵感，也可以来自理论自身的预见力。波普尔反对循规蹈矩地遵守归纳法，给科学家的想象力和自由创造活动留下更为广阔的天地。他的科学方法论强调，经验材料的积累和实验证据的数量并不是创立理论的决定性条件。科学理论起源于大胆的假设。这些假设不管按现有的知识标准是如何不合理，一旦它成功地解决了现有知识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便被确认为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这种科学方法鼓励科学家主动地发现问题，大胆地假设。既敢于批评公认的权威，也欢迎对自己假设的证伪。现代科学的灵魂和发展动力是不断地创新。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为科学创新指出了路径和方法，因此受到了科学家的广泛好评。

2.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影响

20世纪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有些人采取了反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比如，海德格尔流露出的对现代技术的不信任感，法兰克

^① 转引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

福学派对“工具理性”之意识形态特征的批判,最后竟致费耶阿本德作出了科学是最新的教条、最新的宗教的断言。^①哲学家常常指责说,科学的进步非但没有提高人的价值,甚至以忽视或牺牲人的价值为代价。这些指责引导一些人相信,民主精神崇尚价值观念,与科学精神难以相容。他们把科学、理性当作与民主和自由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来反对。

与这些把科学与民主割裂开来的哲学相反,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是科学观和民主观相统一的理论。科学和民主都是排错的过程,科学寻求证伪,民主寻求避害;两者都服从一个非决定论的操作程序,科学知识增长遵从进化模式,而开放社会实行渐进的社会工程;两者都向来自对反面的批判开放,科学假说要求证伪性的严格检验,民主制度要求权力的制衡;两者都给个人主义的自由留下了广阔的天地,科学活动中的猜想不受拘束,开放社会的个人幸福不被控制。

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西欧的左派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青年学生大抵以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新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代表了英美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在本书开端提到的联邦德国左派学生抗议“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入侵”可以说是这两种政治立场的一次交锋。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

^① 分别见 M.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H.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One-Dimensional Man*; 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者。但两人的批判却有不同的风格。哈耶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市场经济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前提出发,批判极权主义的计划体制和集体主义,而他所依据的这些观念和前提,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针对的靶子。哈耶克的批判属于“外部批判”,而波普尔的批判是“内部的批判”,而不是“外部的批判”。这两者有何区别呢?

一个意识形态,有点像库恩所说的“范式”,它自成体系,有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论证的方法和判断真伪是非的标准。依据一个意识形态的信念、方法和标准从外部对另一个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固然可以巩固批判者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却不大可能说服被批判者。被批判者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批判者的还击可以产生同样的效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通常说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调和的,争论的双方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进行的是宣传战,而不是相互理解的对话。

所谓内部批判,顾名思义,就是站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内部,从该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前提出发,并使用它的语言,最后引申出和这一意识形态相违背,或者它所不能解释的结论,以此揭露该意识形态体系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和错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内部批判。波普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观察了这一理论所解释的社会现象,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的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发展,马克思主义被它所解释的事实证伪了。

波普尔的内部批判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严重的挑战。《马克思传》的作者伯林(1. Berlin)说:“卡尔·波

普尔博士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具有罕见的创新性和力量的著作,它的第二卷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作出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作者所能做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评。”^①英国哲学家麦基(B. Magee)甚至说:“我不明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读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如何还能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②

第二节 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批评

现代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强盛的哲学运动始于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自觉地在他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并自诩从根本上挫败了逻辑实证主义。但是,很多研究者认为,波普尔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分享着共同的问题;并且导致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前提也基本相同。波普尔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的区别,他在许多方面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只是60年代以后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才从根本上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划清了界线,使科学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本人承认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有承上启下作用:它上承逻辑实证主义之余绪,下开历史主义学派的先河。不承认波普尔哲学的这种特殊重要性,我们将无法理解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脉络。我们既要承认波普尔的证

① I. Berlin,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8.

② B. Magee, *Karl Popper*, Viking Press, New York, p. 89.

伪主义在现代科学哲学中作用,也要看到他的局限。为此,以下围绕五个问题对他的科学哲学加以批评,前三个问题是我的质疑,后两个问题要用科学哲学发展的事实来说话。

1. 证伪原则与证实原则根本对立吗?

波普尔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第一本书《研究的逻辑》在维也纳学派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强烈的反响。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挑战是无法应付的。这迫使卡尔纳普等人转而研究归纳逻辑的问题,但归纳逻辑本身也遇到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因此不得不放弃了以归纳法为基础的证实原则,最后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后瓦解。波普尔不无得意地夸耀说,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洪谦先生认为,波普尔的自诩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是不正确的。他说:“一位像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把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谋杀引为自豪,这在哲学史上确是罕见的。但是我相信,波普尔的谋杀实际上并没有得逞,因为他为此所使用的武器并不那么锐利,不足以置逻辑实证主义于死地。”^①

从字面上看,证伪原则和证实原则似乎势不两立,其实在理论上两者是互补的。洪谦说:“任何一位科学理论家都必须承认,作为经验有效的命题的自然规律具有无限多的全称命题的形式,而这种自然规律的

^①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1页。

普遍命题并不和作为有很多的具体命题相对应。也就是说,它既不能通过某个或某些基本命题得到证实,也不能被它们所证伪。对此,卡尔纳普发表了一个极有见地的看法:在科学命题的可确定性中,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只能作为特例来看待。”^①

在我看来,波普尔确实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证伪原则与证实原则的根本对立。波普尔关于归纳法的概念是粗糙的、片面的。归纳法并非下是逐个地列举正面事例来证明某个结论的简单枚举法。归纳法的倡导者都自觉地克服简单枚举法。例如,培根曾强调说,反面事例是比正面事例价值更高的证据,因为一个理论只有在它的对立面被否证的情况下才能被证实。他提出了搜集证据的“三表说”,即,在作出归纳之前,不仅要注意到正面的事例(存在表),而且要注意到反面的例子(缺乏表),还要注意到程度不同的事例(程度表)。穆勒在《逻辑体系》一书中介绍归纳推理时也提醒说,重复多次的正面经验不比那些既能支持一个理论,又能反驳与之相反的理论的一次性经验更有价值。由此可见,归纳法不仅是证明一个理论的方法,它同时也是否证与所要证明的理论相反的理论的方法。

波普尔会辩解,归纳法的根本目标是证实,证伪在那里仅仅是证实的一个步骤,而他的科学方法以排错、证伪为最终目标;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然而,证伪方法和归纳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他所设想的泾渭分明的界线。科学研究和发明活动不可能总是否定性的。

^①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1页。

证伪作为检验理论的方法,总要肯定和确立那些否证不了的理论。波普尔用“严格检验”、“确认”等概念说明证伪方法的肯定性结果。波普尔又会说,“确认”与实证主义所说的“经验证实”不同。我们可以接着讨论下一个问题:“确认”与“确证”真的有根本的区别吗?

2. “确认”与“确证”根本不同吗?

波普尔说,他的“确认”概念和卡尔纳普的“确证”概念根本不同,“确认”表示发生概率很小的事例,而“确证”表示发生概率很大的事例。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混淆了概率统计的不同条件。确认新理论的事例的发生概率是根据旧理论(即波普尔所说的背景知识)推算的,而确证一个理论的事例的发生概率是从该理论自身中推算出来的。因此,“确认”概念中的低概率未必不是“确证”概念中的高概率,反之亦然。如果我们用概率公式表示这两个概念,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波普尔的“确认”概念表示,一个被理论所预测的事实之发生概率大于该事实在没有被预测条件下的发生概率。设事实 x 在背景知识中的发生概率为 $P(x)$,它在新理论 y 中的发生概率为 $P(x, y)$,那么事实 x 对理论 y 的确认 $C(x, y)$ 的意义是:理论 y 成功地预测了在流行理论看来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事实 x 的发生,即:

$$C(x, y) = P(x, y) > P(x)$$

另一方面,卡尔纳普的“确证”概念的意义是,理论 y 之为真的概率随着它所预测的事实 x 之发生概率的增大而增大,即:

$$Co(X, y) = P(x, y)$$

比较 $C(x, y)$ (读作 x 对 y 的确认) 和 $Co(x, y)$ (读作 x 对 y 的确证)。不难看出, 两者的概率值相等。所不同的是, “确认” 概念表示的概率值是相对于一个较小的概率值而言的, 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确认指示发生概率很小的事例的理由。但这一理由并未否认, 该事例之发生将会使预测它的理论之为真的概率增大。换言之, $P(x, y) > p(x)$ 并不与 $P(x, y)$ 相矛盾, 两者所表示的概念, 即确认和确证这两个概念, 是可以兼容的。

3. 试错法在逻辑上优于归纳法吗?

波普尔反对归纳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休谟的怀疑论思想: 单个的经验事实, 无论重复多少次, 也不能证明全称命题的必然性; 然而, 一个经验事实却足以证伪一个全称命题。两相比较, 试错法在逻辑上优于归纳法。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另一种比较可以说明相反的结论。根据后一种比较, 我们可以说, 单个的经验事实, 无论有多少个, 也不能证伪一个单称命题, 然而, 一个经验事实却足以证实一个单称命题的真实性。比如, 归纳法固然不能证实全称命题“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试错法也不能证伪单称命题“有一只天鹅是黑色的”。同样, 试错法固然能够证伪上述全称命题, 归纳法也能证实上述单称命题。从逻辑的观点看问题, 两者各有对方所没有的优越性。

波普尔也许会反驳: 科学理论都是用全称命题表达的, 因此, 人们无需顾虑单称命题不能被证伪的情况。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 波普尔关于“严格检验”的

概念是建立在单个事例基础上的。按照他的观点,严格检验是对旧理论的证伪,但却不是对新理论的证实;因此,一个事例便可以起到严格检验的作用。但是,单个事例是由单称命题陈述的,对单称命题的严格检验要求它所陈述的事例既能够被证实,也能够被证伪。如果单称命题不能被证实的话,那么对某一事实作出的预测如何能够说通过了“严格检验”呢?

对波普尔来说,任何理论都是猜想和预测。当他否认了归纳法对全称命题所表达的预测的证实之后,他却暗地里认可对单称命题所表达的预测的“证实”。我们固然不能因此而指责波普尔思想自相矛盾,但这至少可以说明,证实和证伪不是互相排斥的原则和方法。

4. 只有证伪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吗?

在波普尔看来,对科学知识积累最有意义的事件是证伪旧理论,而不是证实新理论。因此,波普尔所钟爱的科学史上的事例是拉瓦锡的煅烧实验、埃丁顿的日食观察和宇称宇恒实验。这些实验都起到否定流行理论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实验,即对流行理论的证伪起决定作用的一次性实验,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大多发生在科学革命的时期。设计这些实验的理论也不完全是猜想,而是针对面临的问题,在几个可行性方案中,根据以前的实验结果所作的合理选择。

科学史上的检验通常不是波普尔所说的意义上的一次性的证伪。每一个重大科学理论在其诞生时期都会遇到许多不可解释的事例,也就是说,都会面临着被证伪的可能。如果科学家们按照波普尔的方法论行

事,就会匆匆地放弃这一理论,致使新理论夭折在襁褓里。在实际中,科学家们通常无视事实的证伪,坚持自己的理论,最后成功地把否认这一理论的事例转变成与该理论相符合的事例。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的物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不是波普尔所设想的不断提出假说、不断证伪假说的过程。

面对着这些不利的证据,波普尔认识到极端的证伪主义之弊端。他表示,一个理论必须具有抵御证伪的相对稳定性,适当的教条主义是对批判精神的合理补充。用他的话来说:“尽可能地坚持一个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理论的价值,我们在发现它的力量的机会到来之前会放弃它,其结果是,没有理论能够给予世界以秩序,能够使我们对付将来事件,能够使我们注意到无法以其他方式观察到的事件。”^①

库恩(T.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换,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光的粒子说到波动说,从牛顿引力论到广义相对论,都是范式的转变。范式的理论较好地解决了证伪和证实的关系问题。对理论的检验都是在一定的范式中的进行的。范式决定了研究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等。在范式容许的范围内,一个理论通过证实被确立,通过证伪被修改或被抛弃。

按照库恩的观点,不同的范式没有“公约性”,不

^①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注1。

能使用一个范式的方法或标准来衡量另外一个范式的真假是非。这个观点被推向极端,也会出现相对主义的问题。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以范式“无公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为主要理由,否认范式的可比性,反对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尝试。费耶阿本德毫不掩饰地宣称,他的理论是方法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是科学哲学中的没有任何纲领和主旨的“达达主义”。

拉卡托斯在波普尔的“一次性证伪”和费耶阿本德的“一切都行”的两个极端中持中间立场。他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瞬间理论”,即,通过一次性的证伪,便能立即把理论驳倒。在科学研究的现实中,一次性的证伪并不被看作决定性的判决,并不一定能说明理论的错误。拉卡托斯说,科学家都是厚脸皮,他们不会甘心一驳就倒。“瞬间理论”既不利于成熟理论的繁衍,又不利于新理论的成长。因此,他赞成库恩的科学史观和阶段论,但不赞成其中的非理性主义,尤其反对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倾向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立场。

5. 辅助性的假设没有积极意义吗?

根据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人们应当排除辅助性假设。因为辅助性的假设抵御对原先的假说提出的预测的证伪,降低了原先假说的证伪度。但是,在科学史上,辅助性的假设对新的科学理论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比如,波普尔曾引用海王星和冥王星被发现的事实,说明牛顿力学预测未知事实的力量。拉卡托斯(I. Lakatos)指出,这一事例并不能说明牛顿力学通过了严格检验,因为天王星运行轨道偏差并没有构成对

牛顿力学的威胁。这是因为亚当斯和勒维里叶提出了这样一个辅助性的假说：有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影响着天王星的运转，并且这一引力服从牛顿力学规律。这一事例说明了辅助性假说抵御证伪、保护理论的有益作用。

拉卡托斯用“科学研究纲领”代替波普尔所说的“假说”和库恩所说的“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硬核是经过“试探和纠错”的漫长过程才形成的基本理论，它具有不容反驳和改变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保护带由辅助性假设和应用理论的初始条件构成，它可以随时调整和改变，以应付反常情况，使硬核免遭证伪的伤害。

与科学研究纲领相对应，有两种方法论规则：正面的和反面的“启发法”（heuristic）。反面的启发法消极应付问题，设法改变保护带，把反常解释得符合“硬核”理论，或者完全推翻反常。正面的启发法规定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和途径，它不顾反常的干扰，用实际研究成果把反常转变为正常。

根据两种方法论规则的分，拉卡托斯区别了两种辅助性假设。消极的辅助性假设只能应付反常，不能预测新的现象。积极的辅助性假设能扩大科学研究纲领的适用范围，并增强其预见力。能否提出积极的辅助性假设，是衡量科学研究纲领处于进化阶段抑或退化阶段的重要标准。在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能增生积极的辅助性假设，不断增强其预见力的强度。当它处于退化阶段，便只能提出消极的辅助性假设。穷于应付反常，预见力逐渐减弱。依照预见力强度的这种变化，每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以

至衰亡的历史过程。比如,牛顿物理学是典型的科学研究纲领,力学三大定律和引力定律是其硬核。在它的发生期,许多反常事例涌来。物理学家一方面运用反面的启发法,修改了辅助性假设和理论应用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运用正面的启发法,深化了理论,改进了实验仪器,把反常事例转化为证实事例,促进了研究纲领不断进化。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它才转为退化阶段,并最终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新纲领所代替。

赵敦华讲

波普尔

第三节 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批评

波普尔的反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哲学史的概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评。前一方面的内容遭到一些哲学史家的反批评。他们说,波普尔用现代的观点看待希腊社会政体,他笔下的柏拉图是一个现代柏拉图,一个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敌人的柏拉图,而不是生活在古希腊社会里的那一个柏拉图。比如赖文森(R. Levinson)在《保卫柏拉图》一书中,考因弗斯(M. Cornforth)在《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一书中,都详细地指出了波普尔对柏拉图所处环境和他的思想的误解或歪曲。同样,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鲁士王国的工具。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这一意识形态是德国市民阶级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特殊反应,既可以为国家极权主义服务,但也包含着反对思想专制和精神压迫的利器。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肆意歪曲和利用,并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必然后果。

波普尔政治哲学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影响最大的部

分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波普尔提出反批评,但都不那么有力和成功,并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而销声匿迹了。但这不意味着,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毋庸置疑的。我在下面提出四个方面的质疑。

1. 波普尔完全否定了马克思的理论吗?

这一问题不是针对波普尔本人的,而是对如此解释波普尔的政治哲学的人所提出的质疑。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批判,使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对马克思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波普尔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凶恶敌人。毋宁说,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对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证伪,在证伪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论的价值。首先,波普尔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其次,这一科学在被证伪之后仍然具有现实作用。

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他对社会发展的预测是可以证伪的。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一个理论的内容越丰富,证伪度越高,科学性也越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符合这一科学的标准。这一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具体的、精确的预测,比如,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资本垄断、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爆发,以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在波普尔的时代,马克思的预言中的一部分没有实现,如无产阶级并没有贫困化,也没有在发达国家发动革命;另一部分似乎被实现,实际上违反了马克思的思想,比如,虽然出现了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阵营,但这些落后国家的公有制

不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波普尔据此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被证伪。这一学说被证伪,并不是因为它不是科学;恰恰相反,能被证伪的学说才是科学的。那些论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发达国家发生、而只能在落后国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对马克思的预言提出的“辅助性假设”,使得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证伪成为不可能。波普尔所攻击的伪科学,包括这种不可证伪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马克思的理论,始终保持着尊重科学的认真态度。当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宗教时,波普尔站出来为马克思辩护。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理性的主张;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通过纯粹理性的手段来说明社会主义将会到来及如何到来的科学家”。^①

即使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一被证伪的科学理论也不应该被放进历史博物馆。相反,波普尔说,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但是因为马克思的批判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找到了诊治这些弊病的更好的方法;而且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具有追求人道、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伦理,这种社会伦理是开放的社会所必需的。波普尔说:“在马克思的实践伦理中,像自由、平等之类的范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毕竟是那些严肃地对待1789年的理想的人之一。他看到像‘自由’这样的概念如何受到了无耻的歪曲。这就是他口头上不宣扬自由而在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行动上宣扬自由的原因。他想要改进社会,而改进对他意味着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高的生活标准,尤其是缩短劳动日(这能立刻给工人某些自由)。”^①马克思的社会伦理不仅只是理想,而且是行动的纲领,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波普尔提倡的批判理性主义是相一致的。因此,波普尔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又维护它。他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死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和它对自由的热爱必然继续存在。”^②

2. 马克思的预言完全落空了吗?

波普尔证伪马克思的理论的主要根据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落空了。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两方面的预言: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是资本的全球化。这两方面的预言是彼此相关的。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根据是他关于世界历史的学说。他说,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的“铁的必然性”,“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未来的景象。”^③他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必将取代世界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那里重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同样的历史进程,其结果是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兴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世界

①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范围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但全球化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马克思精确地预言到,全球化首先是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引起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现在读到这些文字,人们不禁为马克思预言的准确而惊叹不已。马克思预言的资本的全球扩张即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他所预言的“精神的生产”的全球化或“世界的文学”即人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的全球化和各民族的思想融合。同样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地方的思想文化必将全力抵制全球化,但这只是逆世界历史潮流的反动,只是无可奈何的“反动派的惋惜”。马克思说得好,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马克思在这里是在阐述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以价值判断或宗教的、道德的理由来反抗和谴责这一必然性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归宿,他指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是为了指明为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前途。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没有完成之前,在无产阶级没有成为世界的统一力量之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结论:不能因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就断言马克思的预言已经被彻底证伪。

3. 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论是伪科学吗?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下发动的。波普尔认为,这一革命的依据是作了一定的修改的马克思的理论。确实,列宁修改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预言,提出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国际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用其中一部分在本国豢养工人贵族,成功地瓦解了无产阶级革命。他指示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把在那里进行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转变为打击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普尔把列宁等人的理论看作是辅助性假设,指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了不可证伪的假科学。他的政治批判与他的激进的证伪主义的立场有关。列宁的理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修改的主

要作用不是保护马克思主义,不是抵御证伪,而是指导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预言。并且列宁的新预言并非没有事实的验证。二次大战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掀起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不同程度地确认了列宁的理论。如果把列宁的理论称作辅助性假设,那么,它是拉卡托斯所说的能够增强理论预见力的积极的辅助性假设,而不是只能应付反常,不能预见新的事实消极的辅助性假设。奥赫尔(A. O'Hear)在其评论波普尔哲学的书中说:“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新的假说来化解对某些马克思预言的证伪,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非科学,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即使这些预言不很精确,但这些补救性的假说自身,难道不能说是对第三世界运动和工业社会里异化团体的愤懑,所作的新的、合理而又成功的预言吗?”^①

至于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现在不再具有指导和预测现实的作用,这并不奇怪,而且符合波普尔关于社会科学的短期或局部效用的思想。既然改良资本主义的“渐进社会工程”处在不断的修改、调整和证伪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苛求马克思主义,要求它一劳永逸地预见未来的发展,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修改自身呢?波普尔的批判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的僵化思想是有效的,但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未必适用了。

^① O'Hear, *Karl Popper*, London: Routledge, 1982, p. 104.

4. 政治哲学不应当讨论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吗？

根据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开放社会的思想自由原则和民主制度可以使社会成员通过理性的、自由的辩论来发现可行的渐进社会工程，不断地改进社会。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科学家团体，把报纸杂志看作是科学学刊，把议会看作是科学会议，把政府看作是从事证伪各种政治主张的实验机构。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批判使他忘记了，不论在何种社会里，人们在政治争论中的立场不可能完全受纯粹的理性支配，而不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人们依据不同的利益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其他社会集团。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争论也不完全是靠理性来解决的，各派社会力量的平衡往往是通过不合理的仲裁达到的。

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过分关注人类理性的发展，热衷于为渐进社会工程的决策理论提供依据，却没有回答“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说”，近代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被波普尔归结为对“谁应当统治”的错误问题的错误答案。其实，这些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应当统治”的问题。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对社会的性质、起源、基础和一般原则的探讨，都关心社会正义的问题。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使他忽视了正义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关心如何制约统治者的权力，却并不关心如何分配社会权益的问题。波普尔之后的政治哲学

填补了他留下的这一理论真空。

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没有正义的社会组织正如缺乏真理的思想体系一样。一种思想理论,不管它如何精巧和实用,只要它不是真理,就要被否定或修正。同样,一种社会组织,不管它是如何严密和有效,只要其缺乏正义,就要被抛弃或改革。因此,正义的原则是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性质的首要标准。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指的是社会权益分配的正义。他没有区别权利和责任、利益和义务,又把社会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统称为基本利益,包括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基本权利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人们之所以组成社会,就是因为他们指导社会中的人能够获得他们单凭个体力量所得不到的利益。但是,社会成员的利益既是一致的,也是冲突的。每一个人都有获得较大份额的利益的欲望和唯恐得到较少份额的顾虑。因此,社会需要一些原则来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基本利益。这些原则是否公正,决定着这个社会是否正义。社会的正义首先就是分配的公正,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社会分配原则的公正。

罗尔斯和波普尔、哈耶克,乃至边沁、穆勒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提出的理论也大相径庭。如果仔细梳理英美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那么可以看出,波普尔的政治哲学在从功利主义向正义理论的演化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至于超越了波普尔的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我会在另一本讲罗尔斯的书中予以评介。